

士人學術交遊圈：一個學術史研究的另類視角 (以宋代四川為例)*

鄒重華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

引言

研究歷史上士人間的交遊關係，歷來不乏其文。¹但多以一人為中心，考訂與之有交往的士人，一一加以介紹，多屬資料彙集性質；或討論二至數人間的交遊關係，範圍較窄。

近十年來，出現了幾篇在研究士人交遊關係方面饒有新意的文章。日本學者伊原弘教授在1991年8月中旬舉行的北京「國際宋史研討會」上，宣讀了題為〈宋代知識分子的基層社會——以汪應辰的交往關係為中心〉的論文。²伊原氏檢討以往的研究，幾乎都是以特定的政治性的地域婚姻關係和交流關係等為中心而進行的考察。伊原氏對海內外學者長期以來研究宋代士大夫交遊關係側重點之概括是準確的，而他本人過去的研究傾向亦如此。³儘管伊原弘收入論文集的這篇文章內容不完整，

* 本文在修改過程中，承蒙學友段玉明君提供寶貴意見，特此鳴謝！

¹ 如楊慶存：〈蘇軾與黃庭堅交遊考述〉，《齊魯學刊》1995年第4期；向以鮮：〈劉克莊交遊考III〉，載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代文化研究》第三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425-43；胡益民：〈趙師秀交遊考〉，《文獻》1991年第2期；曹寶麟：〈米芾與蘇黃蔡三家交遊考略〉，《中國書法》1990年第2期；張宏生：〈《江湖集》編者陳起交遊考〉，《文獻》1989年第4期；龔放：〈陸遊與范成大交遊考〉，《南京大學學報》1986年增刊。以上舉研究宋代的文章為例，其他朝代的研究亦大致如此。

² 載鄧廣銘、漆俠（主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543-55。

³ 參見伊原弘：〈宋代明州における官戸の婚姻關係〉，《中央大學大學院研究年報》1號（1972年3月），頁157-68；〈宋代婺州における官戸の婚姻關係〉，《中央大學大學院論究》6卷1號（1974年3月），頁33-43；〈宋代官僚の婚姻の意味について〉，《歴史と地理》

但他在「結語」中提出宋代士大夫間的學問紐帶具有重要意義這一點，卻是頗值得留意的。⁴

1995年12月，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蕭啟慶教授在臺北「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了論文〈元朝多族文士圈的形成初探〉。⁵蕭氏從社會文化史角度，研究元朝各族士大夫通過姻戚、師生、座師與同年、同僚、同鄉為經緯所形成的社會網絡，文人之間通過詩文唱和、觀書讀畫、題跋贈序等活動以切磋攻錯和敦睦情誼的文化互動，從而探討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族文化圈的形成，及其在族群融合上的意義。其研究視角新穎。

1996年6月下旬，「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行，北京大學歷史系鄧小南教授提交會議的〈龔明之與宋代蘇州的龔氏家族：兼談南宋崑山士人家族的交遊與沈浮〉⁶一文，在第三部分的第二節，討論了「以王葆等人為中心的崑山士人交遊圈」，主要是從社會史角度，對研究南宋前期蘇州崑山之士人交遊圈，作了有益的嘗試。

概而言之，迄今為止，除伊原弘嘗試探討汪應辰個人的交遊關係以外，尚未見有其他從學術史的角度研究歷史上士人（尤其是士人群體）交遊圈的論著發表。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峰，學術文化發達，並形成京洛（開封、洛陽）、江浙、江西、福建、四川等若干中心。筆者在探討宋代四川學術文化發達原因的過程中，試從士人學術交遊圈的角度加以研究，發現整個兩宋時期，四川地區都存在著士人學術交遊圈子，尤其是以成都府為中心，聯接周圍諸多州縣的士人群體，

〔上接頁97〕

254號（1976年），頁12-19；〈宋代の浙西における都市士大夫〉，《集刊東洋學》（仙臺：東北大學中國文史哲研究會）45號（1981年5月），頁44-62；〈宋代の士大夫覺を書——あなたに問題の展開のために〉，載宋代史研究會編宋代史研究報告第二集《宋代の社會と宗教》（東京：汲古書院，1985年），頁257-96；〈中國知識人の基層社會——宋代温州永嘉學派を例として〉，《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4號（802），頁82-103。

⁴ 伊原氏為彌補傳統研究之不足而撰寫的上述論文，除序言和結語外，共分三部分：（一）信州的地理位置；（二）汪應辰生憑；（三）交遊錄。令人遺憾的是，收入論文集的這篇文章並不完整，第三部分僅有一不足三百字的簡單說明，而伊原氏根據《宋史》及《文定集》（汪應辰撰）的相關內容製成之汪應辰交遊圖表及其分析探討均付諸闕如。

⁵ 蕭啟慶：〈元朝多族文士圈的形成初探〉，載《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96年），頁165-90；後改名〈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收入蕭氏《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頁203-42。

⁶ 鄧小南：〈龔明之與宋代蘇州的龔氏家族：兼談南宋崑山士人家族的交遊與沈浮〉，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頁81-109。

形成龐大的西川士人學術圈。這一研究角度，有別於以著名學者為代表，以其著作、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傳統學術史研究取徑，對瞭解一時一地之學術風氣、學術發展和學術流派之形成，以及學者間的互動關係，均甚有助益。本文即以宋代四川為例，從士人學術交遊圈的角度研究宋代四川學術發展的狀況，嘗試探索另一種學術史研究的視角，俾作為傳統研究方法之補充。

由於士人宦遊四方，下述士人的學術交遊關係，並非都發生在四川本土，但無論在何地，大多是他們在故鄉建立的交遊關係的延伸而已。同時，蜀籍士人宦遊四方，外地士人宦遊四川，使蜀籍學者又與其他地區的學者有著廣泛的交往關係，從而形成更大的學術網絡。換言之，一地之士人學術圈，不可理解為一個封閉的群體。限於篇幅，除必要情況外，本文一般不涉及蜀籍士人與外籍士人的交往關係。

北宋前期之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

唐末五代，四川社會相對較安定，統治者又喜好文藝，故成為北方士人避亂之所。自安史之亂以來，有大量的士人家族遷居入蜀，為四川的士人社會增添了新鮮血液，成為宋代四川學術發展的重要生力軍。⁷但在北宋初期，四川士人因五代之動盪，安於鄉里，不樂仕進，士人學術圈子亦較狹小。這時之主要學者有樂安先生任奉古及其弟子李旼等人。

宋初蜀士不樂仕進，張詠首次治蜀（太宗淳化五年至真宗咸平元年〔994-998〕），訪察到有學行而為鄉里所服者張及、李旼、張奎等，敦勉其就科舉，結果三人悉登科入仕，蜀中士風為之一變。⁸張及、張達均為成都人，與李旼同郡。《宋元學案補遺》作者將李旼歸為張詠門人，將張及、張達視為李旼同調。⁹實則李旼另有師承，且與二張為同門弟子。此三人中，以李旼在學術上的影響最大。

李旼字渭卿，¹⁰自號「谷子」，華陽人。張詠治蜀前，李旼以著述為志，不樂仕

⁷ 參見鄒重華：〈士族與學術——宋代四川學術文化發達原因探討〉（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歷史學部博士論文，1998年），第二章。

⁸ 韓琦：〈張公〔詠〕神道碑銘〉，載張詠：《乖崖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第一〇八五冊，附錄，頁十八上（總頁661）。據范鎮《載酒亭記群公畫像記》，仁宗大中祥符時張及為侍御史，張達為職方員外，慶曆時李旼為虞部員外。該文載傅增湘（篆輯）：《宋代蜀文輯存》（香港：龍門書店影印，1971年），卷九，頁六下至七上（總頁146-47）。

⁹ 王梓材、馮雲濠（輯）：《宋元學案補遺》（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卷九〈百源學案補遺上〉，頁六十上至六十一下。一說張及為綿竹人。

¹⁰ 本文所提及的學者，一般都在首次出現名字時標出其生卒年。但像李旼這類生卒年不詳者，則只好付諸闕如。

進，隱居永康軍白沙山，從之學者甚眾。¹¹李旼以經術著稱，著述甚豐。¹²張及為楊錫所撰〈哀亡友辭〉中，記述他與李旼、張逵、任玠、楊錫「結文學友，咸治經義於樂安先生〔任奉古〕，悉潛心於六教。然後觀史傳，遍百家之說，探奧索微，取其貫於道者。既積中而發外，遂下筆楮〔著〕文」。¹³

任奉古為成都早期著名鄉先生（民間私學教師），¹⁴其再傳弟子漢州綿竹楊繪述其學術傳承云：「莊遵以《易》傳揚雄，雄傳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絕。傳至沛周郊，郊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凱，凱傳繪。」¹⁵

沛周郊、廣凱未見其他文字記載，生平不詳，對任奉古所知亦不多。據《宋史·藝文志》所載，任奉古著有《周易發題》、《孝經講疏》、《明用著求卦》（均佚）。¹⁶《孝經講疏》有張九成解四卷。張九成（1092–1159）為錢塘人，學於楊時，中紹興二年

¹¹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百部叢書集成》影《知不足齋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卷六〈文儒·李旼〉記：「〔李旼〕為張乖崖所器，少日一出庭〔廷〕試。後隱居永康軍白沙山，後生從之學者甚眾。任中正薦，乞賜處士之號，詔以為試校書郎。凌策又薦之，召授試懷寧主簿、國子監說書。」（頁八下至九上）此說意指李旼科舉不第，後因薦而得官，與韓琦〈張公神道碑銘〉所述不同。王說為楊芳燦等：嘉慶《四川通志》（臺北：華文書局，1967年）及《宋代蜀文輯存》作者考所引用。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澠水燕談錄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云：「〔《郡齋》讀書志〕稱其〔王闢之〕從仕四方，與賢士大夫燕談，有可取者輒記，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所記諸條，多與史傳相出入。其間如誰傳佳句到幽都一詩，乃蘇轍使遼時寄其兄軾之作，而誤以為張舜民；又如柳永以夤緣中官獻醉蓬萊詞，為仁宗所斥，而以為仁宗大悅之類，亦間有舛訛。」（卷一百四十，頁1190）據黃休復：《茅亭客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〇四二冊）卷十〈任先生〔玠〕〉，任中正帥蜀之日，曾禮待李旼的學友任玠，後凌策帥蜀，又薦任玠於朝。或王闢之得之傳聞，將兩人之事混於李旼一身。誠如《提要》所言：「然野史傳聞，不能盡確，非獨此書為然。」

¹² 計有《易義》、《孔子弟子傳讀》、《道德經疏》、《道德經音解》、《知命錄》、《該聞錄》、《張乖崖語錄》、《谷子》，歌詩雜文七十卷，《李旼集》十卷等，惜絕大部分已佚。參閱許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成都：巴蜀書社，1986年），頁29–30；范鎮：〈載酒亭記群公畫像記〉。本文所提及之宋代蜀籍學者著作存佚情況，均請參見《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文中一般不再注明。

¹³ 《茅亭客話》卷七〈哀亡友辭〉引張及為亡友楊錫所作〈哀亡友〔楊錫〕辭〉「序」，頁二上（總頁946）。

¹⁴ 參閱鄒重華：〈「鄉先生」——一個被忽略的宋代私學教育角色〉，《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八期（1999年），頁139–62。

¹⁵ 沈驥等：嘉慶《綿竹縣志》，嘉慶十八年（1813）刻本，卷三十九〈典籍志〉，頁一上、一下。

¹⁶ 分見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二百二，頁5038，5066；卷二百六，頁5265。

(1132)進士第一。《宋史·張九成傳》記，張九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¹⁷《孝經講疏》僅一卷，而張九成為其作解卻達四卷之多，則南宋時任奉古的著作尚存世，且為張九成所看重。

任玠(?-1018)學識廣博，人皆師仰之。曾應蜀守任中正之請，講學文翁石室。「大集生徒，講說六經，以紹文翁之化。由是蜀中儒士成林矣」。¹⁸後因蜀守凌策之薦，真宗賜以進士出身。《蜀中廣記》卷九十八記《任玠詩集》有一千二百首，今僅存一首，收入《宋詩紀事》卷九。¹⁹任玠和張逵與成都隱士黃休復相友，黃氏著有《益州名畫錄》和《茅亭客話》，多記唐末五代至宋初成都之事，且多涉遷蜀人士。他自稱江夏人，大概也是唐末五代入蜀之家。

蘇軾〈記郭震詩〉云：「蜀人任介〔玠〕、郭震、李旼，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為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²⁰蘇軾稱此三人為「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當非事實，否則張詠、任中正、凌策等治蜀官員不會大力推薦和任用他們，范鎮亦不會稱李旼為蜀中賢士。²¹蘇軾晚出，大約得之道聽途說。或蘇軾之言為反語，因他本人即為不羈之士。無論如何，蘇軾所記三人之交往，給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史料。郭震為成都廣都人，以詩知名，號「漁舟先生」，有《漁舟前後集》(又名《漁舟集》)，李旼曾為其詩作序。²²

李旼等人亦講學受徒。成都楊損之甫冠，從李旼學。楊損之工詞賦，通《易》、《春秋》、《論語》。屢舉不利，於是自己也作起鄉先生來，「講授諸生，四方從學者不下數百人。每榜計偕、登第者甚眾」。後楊損之於元豐中試特奏，詔賜同學究出身而入仕。楊損之致仕後，「雍容里社，日與致政承議郎任傑漢〔一作漢〕公、承議郎楊武仲子臧游。其後楊咸章晦之以通直郎掛冠歸，即造其間，是為四老。唱和詩中可見矣」。楊審之因追念其父在生時與任傑、楊武仲、楊咸章之交誼，於普賢僧舍中建四老堂並繪像，以資紀念。²³

¹⁷ 卷三百七十四，頁11579。

¹⁸ 《茅亭客話》卷十〈任先生〔玠〕〉，頁六下(總頁963)。

¹⁹ 曹學佺：《蜀中廣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五九一至五九二冊，頁十一下(總頁581)；厲鶚：《宋詩紀事》(臺北：鼎文書局，1971年)，頁二下(總頁514)。

²⁰ 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六十八，頁2130。

²¹ 參見范鎮：〈載酒亭記群公畫像記〉，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九，頁六下至七上(總頁146-47)。

²² 王稱：《東都事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一百十八〈郭震傳〉，頁三上、三下(總頁1821-22)；南宋人(撰)、費著(修訂)、謝元魯(點校)：《氏族譜》，載《巴蜀叢書》第一輯(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郭氏〉，頁249。

²³ 郭印：〈浣花四老堂記〉，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三十九，頁三下(總頁513)。

永康軍導江人代淵(985-1057)，字蘊之，一字仲顏，自號「虛一子」。稍長，從李旼授經，從張逵為文章。中進士甲科，以祿不及親，歸鄉授徒，從學者眾，黃庭堅譽為「蜀之大儒」。²⁴代淵「深探《易》性命之理，作書二十篇，紬復而推原之。《易》家取為雋腴」。田況治蜀(仁宗慶曆八年至皇祐二年[1048-1050])時，盡取其書奏之朝廷，仁宗異之，即家廬拜祠部員外郎。北宋名士宋祁與代淵同登天聖二年(1024)第，「知之也熟」，故應其子之請，為代淵撰銘。²⁵代淵著有《易論》(《周易旨要》)、《春秋義》、《總義》、《佛老雜說》等。

普州馮某(991-1065)，未冠，求師於成都。「是時任玠溫如、李旼涓卿皆以道義文章教授諸生，君執業門下，並為其高弟」。²⁶

成都蒲遠猷(1011-1092)曾學賦於代淵，受《易》於任維翰。²⁷任維翰為成都鄉先生，與代淵同時。成都雙流章督(993-1068)未冠治經術，往來成都，求師質問大義，亦從任維翰學，「得其要旨妙論」。²⁸章督博通經學，尤長於《易》、揚雄《太玄經》。²⁹

永康軍青城人何中「任道晦處，無意官祿，以聚書為能，以賦詩為樂。蜀之耆儒李旼涓卿、戈〔任〕淵仲顏皆與之友」。³⁰

以上為現存資料所能描述之北宋前期西川士人學術交遊圈的情況，這個學術圈基本上是以樂安先生任奉古及其弟子為主而形成的。有學者將其稱為「樂安學派」，³¹可補《宋元學案》之闕。

²⁴ 蒲遠猷：〈自撰墓誌〉，載《宋代蜀文輯存》卷十七，頁九下至十下(總頁256)；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宋刊本，卷二十四〈蒲仲興〔遠猷〕墓碣〉，頁275。

²⁵ 宋祁：《景文集》，《百部叢書集成》影《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卷五十九〈代祠部〔淵〕墓誌銘〉，頁十六下至十八上。

²⁶ 文同：《丹淵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明刊本，卷三十九〈秘書丞馮君墓誌銘〉，頁291。

²⁷ 蒲遠猷：〈自撰墓誌〉，載《宋代蜀文輯存》卷十七，頁九下至十下(總頁256)；《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四〈蒲仲興〔遠猷〕墓碣〉，頁275。

²⁸ 呂陶：《淨德集》，《百部叢書集成》影《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卷二十八〈沖退處士章督行狀〉，頁三上至四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百四十四〈人物·何維翰傳〉記：「何維翰，字叔良，成都人。南省不第，遂不復應舉，居鄉里，以教導為事。薛簡肅奎薦其文行，賜粟帛。韓魏公琦安撫劍南，時蜀大旱，維翰募民間，得米千斛以助賑濟。琦嘉之，薦授四門助教，辟府學說書。」(頁十五下〔總頁4378])薛奎於仁宗天聖四年至六年(1026-1028)知益州，其時任維翰的學生蒲遠猷為十六至十八歲。何維翰很可能就是任維翰，「何」乃「任」之筆誤。

²⁹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章督傳〉，頁13446-47。

³⁰ 《淨德集》卷二十五〈何君〔敏〕墓誌銘〉，頁九上、九下。

³¹ 參見胡昭曦、劉復生、粟品孝：《宋代蜀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7年)，頁19-21。

本期士人學術圈之特點：一是規模較狹小；二是主要由師生、同門關係形成；三是多為民間人士或較長時間居於民間，以講學授徒為業(如樂安先生任奉古及其門人李旼、張逵、任玠、廣凱，再傳弟子楊損之、代淵等)；四是學術交遊基本上局限於本地，與域外學者少有交流，其學術影響亦限於本地。將其與北宋中期學術繁榮的景象聯繫起來考察，表明經歷了唐末五代的動盪時期之後，四川的學術正處於恢復和重新起步的階段。

表一：北宋前期士人學術交遊圈

姓名	地區	學術交遊關係
任奉古	成都	門人：李旼 張及 張逵 任玠 楊錫 廣凱 再傳弟子：楊損之 代淵 普州馮某 楊繪 蒲遠猷
李旼	成都華陽	任奉古門人，與任玠、張逵、張及、楊錫結為「文學友」。 講友：郭震 何中 門人：楊損之 代淵 普州馮某
張及	成都	任奉古門人，「文學友」成員。
張逵	成都	任奉古門人，「文學友」成員。 門人：代淵 講友：黃休復。
任玠	成都	任奉古門人，「文學友」成員。 門人：普州馮某 講友：郭震 黃休復
楊錫	成都？	任奉古門人，「文學友」成員。
廣凱	？	任奉古門人 門人：楊繪*
黃休復*	成都	講友：任玠 張逵。
郭震*	成都廣都	講友：李旼 任玠
何中*	永康軍	講友：李旼 代淵
楊損之	成都	李旼門人 講友：任傑 楊武仲 楊咸章
代淵*	永康軍導江	李旼、張逵門人。 講友：何中 門人：蒲遠猷*
任維翰	成都	門人：蒲遠猷 章督*

注：凡帶*者，屬唐、五代遷蜀家族。

在北宋前期的學術交遊圈中，有幾位學者與中期的士人學術交遊圈有關係。與李昉、代淵為友的永康軍何中，其孫何大章與呂陶為姻親；郭震所屬的成都廣都郭氏與諸多學術家族有婚姻關係；而楊繪、蒲遠猷及章惇則亦為北宋中期士人學術圈中之人。

北宋中期之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

本期士人學術交遊圈的核心：華陽范氏、眉山蘇氏、梓州文同和成都呂陶

自張詠治蜀以後，歷任治蜀官員亦都興學薦士，配合朝廷科舉取士名額的不斷擴大，蜀中士風漸變，讀書求仕蔚然成風。³²至北宋中期，文人學者大量湧現，士人學術圈子急劇擴大，此時居於核心地位之學者有華陽范氏、眉山三蘇父子、梓州文同、成都呂陶。

成都華陽范氏為宋代四川著名學術家族，兩宋間出了不少著名學者。范氏同兩宋蜀籍重要學者多有交往，又與不少學術家族通婚。

范鎮(1008-1088)是范氏家族崛起的關鍵人物，也是第一位著名學者，由於其在朝廷中的地位，其知名度亦高。蘇軾云：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司馬光)、景仁(范鎮)。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³³

三蘇父子自蜀守張方平於仁宗嘉祐間(1056-1063)推薦入京，再經歐陽修舉薦於朝，於是名動天下。三蘇揚名以前，蘇洵已與蜀中士人有所交往；揚名之後，更與諸多蜀士建立了學術關係，成為北宋中期蜀士之核心人物。

范鎮與蘇洵為益友，蘇軾從其遊，關係十分密切。范鎮逝世後，蘇軾為其撰墓誌銘。蘇軾與范氏一門四代相交，與范鎮三子百嘉、從子百祿、從孫祖禹、曾孫范沖(祖禹長子)亦都厚善，過從甚密。³⁴蘇轍亦與范鎮及其子孫輩交往密切，詳見氏著《樂城集》。范氏與蘇氏之婚姻關係，則連綿兩宋。

³² 參見鄒重華：〈士族與學術——宋代四川學術文化發達原因探討〉，頁54-90。

³³ 《蘇軾文集》卷十四〈范景仁〔鎮〕墓誌銘〉，頁435。

³⁴ 同上注，卷五十〈答范蜀公十一首〉、〈與范子功〔百祿〕六首〉、〈與范子豐〔百嘉〕八首〉、〈答范純夫〔祖禹〕十一首〉、〈與范元長〔沖〕十三首〉，頁1446-63。並參見范祖禹：《范太史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一〇〇冊)卷二、卷三范祖禹與蘇軾唱和詩(總頁96-110)。

文同(1018-1079)字與可，自號「笑笑先生」，因為漢文翁之後，又世稱「石室先生」。³⁵文同曾祖彥明、祖廷蘊、父昌翰「皆儒服不仕」，文同幼志於學，中皇祐元年(1049)進士第。³⁶文同以學名世，操韻高潔，博學多才。經史之外，雖星經地理、方藥音律，靡不究，古篆行草皆能精之。好水石松竹，每佳賞幽趣，樂而忘返。發於逸思，形於筆妙，摸寫四物，頗臻其極，士大夫多寶之。是北宋中期著名蜀籍學者。文彥博守成都(慶曆四年至七年[1044-1047])，頗贊賞文同，以文同之文示府學者，「一時稱慕之」。時文同尚未中第。司馬光、蘇軾尤敬重文同，光曰：「與可襟韻游處之狀，高遠蕭灑，如晴雲秋月，塵埃所不能到。某所以心服者，非特詞翰之美而已也。」³⁷文同有《丹淵集》四十卷存世。南宋慶元元年(1195)，為文同編集刊行的家誠之云：

湖州[文同]之文一出，東坡兄弟皆敬而愛之，前輩大老如文潞公[彥博]亦為之延譽，司馬溫公則至于心服，趙清獻公[抃]則至于嘆服，荊公[王安石]、蜀公[范鎮]又皆形之歌詠，湖州之為人可知矣。³⁸

蘇軾自稱為文同從表弟，³⁹《蘇軾文集》中有關文同的篇章頗多，反映了兩人極為密切的交往關係。《丹淵集》附錄亦收錄了不少蘇軾所寫有關文同的詩文，其〈書與可墨竹並序〉云：「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⁴⁰蘇軾與文同有姻親關係，《樂城集》中涉及文同的詩文亦不少。

范百祿與文同同登仁宗皇祐元年(1049)進士第，百祿為其撰墓誌銘，稱凡與文同遊者，「皆名節文行之士顯用於今者」。⁴¹

呂陶(1031-1107)字元鈞，號淨德，成都人。蔣堂治蜀時(仁宗慶曆三年至四年[1043-1044])，呂陶為石室(成都府學)生，蔣堂贊其文乃「賈誼之文」。神宗皇祐五年(1053)登進士第，熙寧間復登制科。歷官殿中侍御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仕神、哲、徽三朝，知名於時，曾入元祐黨籍，有《淨德集》傳世。王梓材在《宋元學案》卷九十九〈蘇氏蜀學略·修撰呂先生陶〉案語中云：「先生嘗入元祐黨籍，以其為川

³⁵ 漢文翁之後留居於蜀，至蜀漢、西晉時，文立徙巴之臨江，從學於著名學者、陳壽的老師譙周，門人推為顏子。其後又徙梓州永泰之新興鄉新興里。

³⁶ 范百祿：〈文公[同]墓誌銘〉，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二十二，頁二十三下(總頁321)。

³⁷ 《丹淵集》，附錄，司馬光：〈小簡〉，頁310。《宋史》卷四百四十三〈文同傳〉將司馬光此段話置為文彥博語，當為刪削之誤。

³⁸ 《丹淵集》，卷拾遺，家誠之：〈跋〉，頁309。

³⁹ 《蘇軾文集》卷六十三〈祭文與可文〉、〈黃州再祭文與可文〉，頁1941-43。

⁴⁰ 《丹淵集》，附錄，頁31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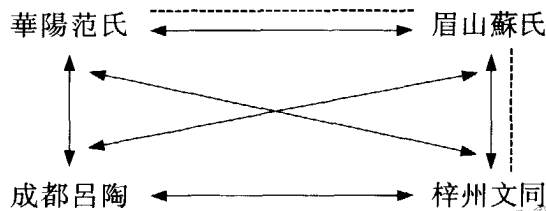
⁴¹ 范百祿：〈文公[同]墓誌銘〉。

黨羽翼，則亦蜀學之魁也。」《宋元學案》列呂陶為蘇軾同調，呂陶又與周敦頤有交往。⁴²

呂陶與范鎮有交誼，范鎮退休，呂陶撰七律〈和寄景仁致政侍郎〉云：「文章道德有源流，進退恬然信自由。身在禁林方倚望，年侵老景便歸休。素雲收雨還層岫，勁柏凌霜茂晚秋。何日家山縱吟賞，閒中情味更優游。」⁴³范鎮因反對王安石新法，於神宗熙寧三年(1070)被迫致仕，時年六十三歲。⁴⁴呂陶對待新法的態度與范鎮同，此詩既為頗負時望的范鎮不得不離開朝廷而感惋惜，又對其表達了安慰之意。呂陶另撰有五言古詩〈送翰林范侍郎〉數百言，進一步表達安慰、贊賞之意。范鎮回四川探親，呂陶又以七律〈和周簡州寄范蜀公三章〉贈之。⁴⁵

呂陶與文同相友，《淨德集》中有〈文與可畫墨竹枯木記〉、〈寄題洋川與可學士公園十七首〉、〈用與可韻為湖亭雜興十首〉等，⁴⁶反映兩人的交誼。蘇軾〈文與可畫贊〉云：「友人文與可既歿十四年，見其遺墨於呂元鈞之家，嗟歎之餘，輒贊之。」⁴⁷

華陽范氏、眉山蘇氏、文同和呂陶的關係，可以下圖顯示：



注：帶箭頭實線表示相互交往關係，虛線表示婚姻關係。

范、蘇、文、呂互為學友，相互間都保持著深厚的友誼乃至姻親關係，他們構成了北宋中期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的核心。

⁴² 黃宗羲(撰)、全祖望(補)、王梓才、馮雲濠、何紹基(校)：《宋元學案》(臺北：世界書局，1983年四版)，頁1866-67；《淨德集》卷二十九〈送周茂叔殿丞並序〉，頁二上至三下。關於呂陶的學術思想，可參考《宋代蜀學研究》，頁65-68。

⁴³ 《淨德集》，卷三十七，頁三上。

⁴⁴ 胡昭曦：〈宋代「世顯以儒」的成都范氏家族〉，載胡昭曦：《胡昭曦宋史論集》(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86-319。

⁴⁵ 分見《淨德集》，卷三十，頁八上至九上；卷三十五，頁四下至五上。

⁴⁶ 分見卷十四，頁九下至十上；卷三十八，頁一上至四上。

⁴⁷ 《蘇軾文集》，卷二十一，頁613-14。

需要指出的是，學者在學術上的成就或後世所獲得的評價，與他們在學術圈中所處的地位不一定成正比。華陽范氏以史學著稱，眉山蘇氏以文學知名，他們在宋代的聲望與學術成就，與其在士人學術圈中的地位相當。而同樣居於士人學術交遊圈核心地位的文同和呂陶，情況就有所不同。文同多才多藝，為蘇軾和蘇轍兄弟、文彥博、司馬光、趙抃、王安石、范鎮等同時期最著名的學者和名相所稱賞及與之交誼。呂陶歷仕三朝，官位崇高，後世稱為「蜀學之魁」。二人之聲望都很高。但二人在學術上的影響及後世對他們的評價，則不及他們在當時士人學術交遊圈中的地位顯要。由於前後世的評價標準會有變化和差異，以及學者著述存佚情況的不同，都會導致某學者在當時及後世的學術地位出現錯位。而研究士人學術交遊圈，正好可以為評價一位學者在歷史上的學術地位提供另一個機會。下述宇文之邵和鮮于侁二位學者，就是極好的例子。

圍繞范氏、蘇氏、文同和呂陶的學術交遊圈(上)

宇文氏為宋代四川詩書名族，⁴⁸ 范鎮為漢州綿竹房的著名學者宇文之邵的母舅。宇文之邵(1029-1082)字公南，號「止止先生」，嘉祐二年(1057)進士，是宋代四川重要學者，為范鎮、司馬光所敬重。⁴⁹《氏族譜》並稱，程珣知漢州時，其子程顥、程頤曾從宇文之邵遊。此說確否未可知，但程珣請宇文之邵典漢州學，足可證明程珣是很看重宇文之邵的。⁵⁰《宋元學案》稱宇文之邵為「蜀學之先」。⁵¹文同與宇文之邵亦有交往，曾有詩贈之云：「從來綿竹多賢者，唯是揚雄識壯夫。」⁵²呂陶與宇文之邵年齡相仿，自少便與之交遊。呂陶《答宇文公南》詩云：「少年從君游，于今已頭白。逡巡三十載，光景如昨日。追懷當時事，感慨橫胸臆。賢侯在泮水，多士凡數百。探道先淵源，學文重氣格。君常露華采，流品推第一。西南有豪俊，自此貴名出。」⁵³宇文之邵後裔嘗編輯其遺文為《止止先生宇文公集》，並請南宋蜀籍著名理學家魏了翁作序，了翁稱宇文之邵「名震京師」。⁵⁴該集今已不存(僅存詩一聯及文二篇)，使我

⁴⁸ 參見王德毅：〈宋代成都宇文氏族系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16期(1991年)，頁81-89。

⁴⁹ 《氏族譜·宇文氏》，頁266；《宋史》卷四百五十八〈宇文之邵傳〉，頁13449-50。

⁵⁰ 程湛輯程頤：《程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私藏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子部第3冊，卷四十六〈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頁三下至五上(總頁698-99)。

⁵¹ 《宋元學案》卷六〈士劉諸儒學案〉，頁147。

⁵² 《丹淵集》卷十三〈寄宇文公南〉，頁129。

⁵³ 《淨德集》，卷三十，頁二上。

⁵⁴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以下簡稱《鶴山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宋刊本，卷五十五〈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頁467。

們不能對宇文之邵的學術及交遊關係有更多的了解，但僅據其與范鎮、文同和呂陶的交往關係，以及他們和司馬光對宇文之邵的推崇，已足顯其在當時的學術聲望和地位。

閬州閬中鮮于氏為宋代四川名族，鮮于侁為其族中最著名的學者。鮮于侁(1019-1087)字子駿，父鮮于至自號「隱居先生」，為蜀名儒。鮮于侁年二十登仁宗景祐五年(1038)進士，官至集賢殿修撰。秦觀〈鮮于子駿行狀〉云：

士之游其門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於新意。晚年為詩與楚辭尤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嘆曰：「今世學經術，未有如公者。」蘇翰林〔軾〕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及；讀公《元〔九〕誦》，以謂有屈宋之風。今天子賜之詔書亦曰：「學足以邇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⁵⁵

魏了翁〈跋鮮于子駿帖〉云：「裕陵〔神宗〕稱其文學，司馬文正公稱其政事，蘇文忠公稱其詞章，泰山孫先生〔復〕稱其經術。公之為人，大略可睹矣。」⁵⁶ 鮮于侁有文集、《詩傳》、《周易聖斷》、《典說》、《治世讜言》、《諫垣奏稿》、《刀筆集》等，其餘未編次者尚多。其著作多佚，今僅存詩五十餘首，文一篇及《鮮于侁文粹》。⁵⁷

《宋史·鮮于侁傳》謂：「侁刻意經術，著《詩傳》、《易斷》，為范鎮、孫甫〔復〕推許。」范鎮又為其撰墓銘，可見范鎮與鮮于侁交誼不淺。⁵⁸

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時蘇軾伯父蘇渙通判閬州，「禮之甚厚，以備鄉舉，侁以獲仕進」。⁵⁹ 故蘇渙於鮮于侁有知遇之恩。蘇軾、蘇轍兄弟與鮮于侁相交厚。《蘇軾文集》存有蘇軾寫給鮮于侁的三封書信，其一云：「伏辱手教，並新文石刻等，疾讀，喜快無量。即辰起居住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此外遠，何也？」其二云：「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蘇軾並將近日打獵所作一闕，「寫呈取笑」。⁶⁰ 蘇軾對鮮于侁《八詠》、《九誦》之嘆賞，分見《蘇軾文集》卷六十八〈題鮮于子駿八詠後〉、卷六十六〈書鮮于子駿楚詞後〉。

⁵⁵ 秦觀：《淮海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海鹽張氏沙園藏明嘉靖本，卷三十六，頁129。

⁵⁶ 《鶴山集》，卷五十九，頁493。

⁵⁷ 范鎮：〈鮮于諫議侁墓誌銘〉，載《宋代蜀文輯存》卷十，頁十一下（總頁161）；《淮海集》卷三十六〈鮮于子駿行狀〉，頁129；《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頁206-8。

⁵⁸ 卷三百四十四，頁10938。

⁵⁹ 蘇轍：《樂城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明活字印本，卷二十五〈伯父〔蘇渙〕墓表〉，頁255。

⁶⁰ 卷五十三〈與鮮于子駿三首〉，頁1559-60。

蘇轍與鮮于侁亦多唱酬，《樂城集》中有〈和鮮于子駿益昌官舍八詠〉、〈嘉雪呈鮮于子駿三首〉、〈送鮮于子駿還朝兼簡范景仁〉、〈次韻鮮于子駿遊九曲池〉、〈遊金山寄揚州鮮于子駿從事邵光〉等。⁶¹其〈送鮮于子駿還朝兼簡范景仁〉云：「蜀中耆舊今無幾，相逢握手堪流涕。……猶有城西范蜀公，買地城東種桃李。花絮飛揚酒滿壺，談笑從容詩百紙。」反映了蘇轍與鮮于侁、范鎮之間的深厚交誼。為鮮于侁撰行狀的秦觀，本為蘇軾門人。秦觀在〈鮮于子駿行狀〉末云：「某被遇最厚，又嘗辱薦於朝。」則秦觀亦承鮮于侁之學澤矣。

文同亦與鮮于侁相交厚，常有詩相唱酬，文同《丹淵集》中現存有〈子駿運使八詠堂八首〉、〈子駿遊沙溪洞〉、〈寄子駿運使〉、〈依韻和子駿雪山圖〉及應鮮于侁之請而作的〈綿州通判廳伐木堂記〉等。⁶²

鮮于侁與宇文之邵一樣，學術著作大多散佚不存，僅剩下若干詩文殘篇，今天已難窺其學術之全豹。只是根據當年與之交遊學者保存下來的記載，使我們知道，他們在當時都是有很高學術聲望的學者。

眉山任氏和青神陳慥也是當時頗負名望而後世寂寂無聞的學者。

眉山任伋（一作汲，1018–1081）字師中，慶曆進士，與其兄孜相繼中第，兄弟二人並知名於時，眉人敬之，號「二任」。二任與蘇洵厚善，及於蘇軾、蘇轍，蘇軾稱為大任、小任。任孜字遵聖，以文學氣節推重鄉里，名與蘇洵等，仕至光祿寺丞。⁶³秦觀從蘇軾遊，久聞二任之風，後識任伋次子大防，故為任伋撰墓表。⁶⁴蘇軾〈祭任師中〔伋〕文〉記其與眉山陳慥、慥為王齊愈、王齊萬兄弟、黃州進士潘丙、古耕道等致祭任伋云：「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之丈人。」談到與任伋的關係曰：「惟慥與軾，匪友則親。」⁶⁵蘇轍《樂城集》有〈送任師中通判黃州〉、〈次韻任遵聖見寄〉詩二首。⁶⁶

任孜有一子，名伯雨，字德翁，中進士第，邃於經術，文力雄健。著有《春秋經聖新傳》、《得得居士薺草》、《乘桴集》等。《蘇軾文集》有蘇軾寫給任伯雨的信，其一云：「昆仲首捷，聞之欣快，起我衰病矣。當遂冠天下士，蔡州未足云也。陳季常〔慥〕歸，又得動止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死矣。」⁶⁷「昆仲」當指任伋（師中）二子

⁶¹ 分載卷六，頁96；卷八，頁120；卷九，頁121–22，129–30。

⁶² 分載《丹淵集》，卷十四，頁133–34，137；卷十六，頁148–49；卷十七，頁154；卷二十三，頁193–94。

⁶³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任伯雨傳〉，頁10964。

⁶⁴ 《淮海集》卷三十三〈瀘州使君任公〔伋〕墓表〉，頁119–20。

⁶⁵ 《蘇軾文集》，卷六十三，頁1944。

⁶⁶ 見卷三，頁71–72。

⁶⁷ 卷五十七，〈與任德翁二首〉，頁1707。

大節、大防，時任伋已去世，其家在蔡州。⁶⁸「首捷」指大節、大防兄弟通過州試，故蘇軾稱「師中不死矣」，意指其二子能繼承父志，嚮學從事舉業。

文同與眉山二任(任孜、任伋)為友。⁶⁹對於任孜所贈詩，文同視作美食、良藥，其〈謝任遵聖光祿惠詩〉云：「尋常得君詩，如隼饑見肉。凡當憂憤際，不可不取讀。……聞君有詩至，猛起捧大軸。拆開得累紙，半日了一幅。使我困病除，如藥清頭目。把詩坐前軒，憤惋幾欲哭。君也實高才，徑庭無馱曲。」⁷⁰任伋任官瀘州，特意遣人送荔枝給文同。⁷¹任伋妻眉山宋氏亡，文同為之撰墓誌銘。

呂陶與眉山二任(任伋、任孜)及任孜子任伯雨均有交往，與二任時有詩唱和。⁷²呂陶稱任伯雨「學有本原，彊明重氣節」，「士林多推之」。⁷³

陳慥字季常，自號「龍丘居士」，為青神陳希亮之子。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舉進士未第)，晚年隱居於光、黃間。陳慥與蘇軾乃故交，軾為其撰〈方山子傳〉。⁷⁴《蘇軾文集》有蘇軾致陳慥函十六封，其六云：「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常為帶來。季常未嘗為王公屈，今乃特欲為我入州〔指黃州〕，州中士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其七云：「鄭巡檢到，領手教。……《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秋末相見，必得拜呈也。」⁷⁵《四庫全書總目·東坡易傳提要》云：「蘇籀《樂城遺言》記蘇洵作《易傳》，未成而卒，屬二子述其志。軾書先成，轍乃送所解於軾，今蒙卦猶是轍解。則此書實蘇氏父子兄弟合力為之。題曰軾撰，要其成耳。」⁷⁶著名的烏臺詩案了結後，蘇軾謫居黃州(神宗元豐三年至七年〔1080-1084〕)，鄰近陳慥隱居之所，向陳慥借書，當是為了完成《易傳》的撰寫。由蘇軾前一封信，可知陳慥是頗負時名的。

呂陶與陳慥亦有交誼，所撰七律〈次韻贈陳季常〉云：「一辰殊不掛胸中，標韻高間辯論雄。詩得江山深有助，道因囊籥易為功。平生擬效漆園吏，何日相逢黃石公。可惜壯年長策在，卻陪明月與清風。」⁷⁷呂陶此詩，既表達了對陳慥才華的推崇，又

⁶⁸ 《丹淵集》卷四十〈任郎中〔伋〕夫人宋氏墓誌銘〉，頁293-94。

⁶⁹ 同上注，卷一〈哭任遵聖〉，頁54；卷四十〈任郎中夫人宋氏墓誌銘〉，頁293-94。

⁷⁰ 同上注，卷四，頁71。

⁷¹ 同上注，〈謝任瀘州師中寄荔枝〔枝〕〉，頁71-72。

⁷² 《淨德集》卷二十七〈夫人呂氏〔任孜妻〕墓誌銘〉，頁五下至七下；卷三十〈答任師中〉，頁十三上、十三下；卷三十五〈送任遵聖之官富順二首〉，頁二下至三上。

⁷³ 同上注，卷二十七〈夫人呂氏墓誌銘〉，頁六上。

⁷⁴ 《蘇軾文集》，卷十三，頁420-21；范鎮：〈陳少卿希亮墓誌銘〉，載《宋代蜀文輯存》卷十，頁十八下至二十一上(總頁164-66)。

⁷⁵ 卷五十三，〈與陳季常十六首〉，頁1565-71。

⁷⁶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頁6。

⁷⁷ 《淨德集》，卷三十六，頁六下。

對其懷才不遇表示惋惜。蘇軾〈答呂元鈞(陶)三首〉中，第二、三封書信都提到陳慥(季常)，⁷⁸可見他們三人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茲再以下圖顯示華陽范氏、閬中鮮于侁、眉山蘇氏、青神陳慥、眉山任氏、梓州文同、成都呂陶、綿竹宇文之邵的交遊關係。



圍繞范氏、蘇氏、文同和呂陶的學術交遊圈(下)

北宋前期士人學術交遊圈之核心人物樂安先生任奉古的兩位再傳弟子楊繪、蒲遠猷以及蒲的同門章彙，也是中期學術交遊圈中之人。

楊繪(1027-1088)屬綿竹楊氏，字元素，號「無為子」。自幼聰穎，讀書五行俱下，老不復忘。專治經術，工古文，尤長於《易》、《春秋》，以其學背時好名。中皇祐五年進士(1053)第二，為仁宗、英宗、神宗所器重。有《群經索蘊》、《書九意》、《詩旨》、《春秋辨要》、《無為編》、《西垣集》、《楊繪集》等著作多種。綿竹楊氏與華陽范氏為世婚，故范祖禹「知公〔楊繪〕最詳」。⁷⁹綿竹楊氏又與四川詩書名族宇文氏有密切的婚姻關係。楊繪與文同、成都宋璋、綿竹章彙相友。宋璋第進士，官太常博士。⁸⁰綿竹章彙學行高，尤邃於《易》，與楊繪、宇文公南(之邵)友善。章彙一試禮部不第，退而結廬紫微山下，號「知退處士」。⁸¹

⁷⁸ 《蘇軾文集》，卷五十九，頁1799。

⁷⁹ 《范太史集》卷三十九〈天章閣待制楊公〔繪〕墓誌銘〉，頁八下至十四上(總頁434-37)。

⁸⁰ 《丹淵集》卷四十〈仁壽縣太君李氏埋銘〉，頁300；《氏族譜·宋氏》，頁255。

⁸¹ 李流謙：《澹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一三三冊，卷十七〈仲結章君〔綬〕墓銘〉，頁十六下(總頁754)。

成都蒲遠猷(1011-1092)為北宋前期士人學術交遊圈中代淵和任維翰的門人，「少而能賦，與女弟幼芝俱有聲於劍南」，與黃庭堅為友。蒲遠猷為慶曆六年(1046)進士，同眉山任氏之任仍有交往，與青神陳氏、成都郫縣張愈有姻親關係。⁸²

成都雙流章督(993-1068)為任維翰的另一門人，前一節提到，章督博通經學，尤長《易》和揚雄《太玄經》。章督與里人范百祿(范鎮從子)有交往，曾為范百祿解述《太玄經》大旨。⁸³蘇軾有《書章督詩》，稱其「善屬文」。⁸⁴章督著有歌詩雜文二十卷、《太玄圖》、《太玄圖經發隱》、《卦氣圖》等，《卦氣圖》以石刻於成都府學之西，《太玄圖》並文集刻於中興寺子雲祠堂。⁸⁵呂陶與章督遊，其《貽草萊章督》詩云：「著圖課見歷象運，發隱扣達乾坤機。……愚聞是書百日就，瀝懇再拜求觀之。先生訓我有大略，筆端粗可言毫釐。……我從誨言日勉勉，始若得濟終無涯。性庸才下道悠遠，策發未進吁可悲。願從諸生北面請，庶幾一釋終身疑。」⁸⁶呂陶以章督道義充於身，文章傳於世，其清名皆可書，故為其撰行狀，「以備史館之載錄云」。⁸⁷

張愈(一作俞)，字少愚，號「白雲先生」。遊學四方，屢舉不第，文彥博洽蜀，曾禮待之。為蜀中名士，有《白雲集》。張愈娶成都蒲遠猷之妹，俱有文名。⁸⁸張愈雖無功名，但在當時的聲望卻很高，與蘇洵、員安輿同為四川學士所景仰的人物。

員安輿祖父員延稟曾從宋初名士陳搏習道論，安輿與其弟安宇皆以學自力，登進士第(安輿登皇祐第)。安輿字文饒，為仁壽人，鄉人謚曰「文質先生」。員氏後裔員興宗云：員安輿「詞最高偉，大儒蘇洵明允、文同與可皆與之定交。此兩人者，立名天下，於世無所推第，獨敬尚文饒甚備。」又云：「文饒才茂異常，與西州處士蘇洵明允、張愈少愚通書周旋文誼。當是時，巴蜀學士深心翰墨者，莫不共高此三人。」⁸⁹員安輿和張愈與蘇洵、文同一樣，都是當時四川的著名學者。

成都郫縣李慎從與文同為密友，其母文氏，與文同為親戚。慎從與名士張愈為友，為張愈所敬重。其弟李慎思與呂陶為同年(皇祐五年[1053])進士。李慎思好

⁸² 蒲遠猷：〈自撰墓誌〉，載《宋代蜀文輯存》卷十七，頁九下至十下(總頁256)；《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四〈蒲仲輿(遠猷)墓碣〉，頁275。

⁸³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章督傳〉，頁13446-47。

⁸⁴ 《蘇軾文集》，卷六十八，頁2161-62。

⁸⁵ 《淨德集》卷二十八〈沖退處士章督行狀〉，頁三上至四下。

⁸⁶ 同上注，卷三十一，頁三上、三下。

⁸⁷ 同上注，卷二十八〈沖退處士章督行狀〉，頁四下。

⁸⁸ 《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四〈蒲仲輿(遠猷)墓碣〉，頁275；蒲芝：〈白雲先生張少愚誄〉，載周復俊：《全蜀藝文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三八一冊，卷五十，頁二上至三上(總頁697-98)。

⁸⁹ 員興宗：《九華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一五八冊，卷二十一〈左奉議郎致仕員公(南圭)墓誌銘〉、〈夫人員氏墓誌銘〉，頁十下(總頁181)、十五下(總頁183)。

《易》、《春秋》，每多論述，著《治策》五十篇，講明世務。李氏與華陽范氏、梓州文氏有婚姻關係。⁹⁰蜀州晉原李彤(1019–1072)與郫縣李氏同族，呂陶少與李彤遊。李彤中慶曆六年(1046)進士，嘗從晉原鄉先生張中行學，得《易》、《春秋》大旨，朋友畏其博聞。嘗著《史斷》十二篇，以鑑治亂。⁹¹

榮州王夢易(?–1086)，皇祐元年(1049)進士，與成都范鎮、蜀州新津張商英、南充何涉、成都郫縣楊天惠等名學者均有交往。⁹²

張商英(1043–1121)字天覺，號「無盡居士」，治平二年(1065)進士，官至宰相。有《三墳書》、《神宗政典》、《大象星經》、《無盡居士註素書》、《宗禪辯》、《張無盡集》等儒、佛、道及詩文著作十餘種。

何涉字濟川，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苦，汎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間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登景祐元年(1034)進士第，為官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遊者甚眾。雖在軍中，亦嘗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有《春秋本旨》、《治道中術》、《廬江集》。⁹³

楊天惠字佑父，元豐進士，以儒學稱，自號「回光居士」。⁹⁴有《楊天惠集》、《三國人物論》等著作。

張唐英(1029–1071)為張商英之兄，慶曆二年(1046)進士，為名臣，有史才，《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錄其著作十種，著名的有《蜀檣杌》、《九國志補》。唐英與范鎮相知，其父特囑唐英，請范鎮為其撰墓銘。⁹⁵唐英以文名，翰林學士眉山孫抃、綿竹楊繪與成都白雲先生張愈皆稱賞之。唐英官歸州時，與夷陵令蔣概、秭歸令鄧綰為文友，名聲籍甚荊湖間。⁹⁶鄧綰為成都雙流二江先生鄧至之子，曾任翰林學士，官至知樞密院。著有《洪範建極錫福論》、《馭臣鑑古論》、《治平文集》、雜文詩賦等。鄧至為著名鄉先生，學問淵博，號「二江先生」。范鎮與鄧至為友，范百祿則從之遊。⁹⁷

⁹⁰ 《丹淵集》卷三十八〈李公澤〔慎從〕墓誌銘〉，頁280–81；《淨德集》卷二十五〈秭歸縣令李君〔慎思〕墓誌銘〉，頁三上至五下。

⁹¹ 《淨德集》卷二十五〈李太博〔彤〕墓誌銘〉，頁五下至九上。

⁹² 張商英：〈王夢易墓表〉，載《宋代蜀文輯存》卷十四，頁十七下至二十上（總頁216–17）。

⁹³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何涉傳〉，頁12842–43。

⁹⁴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廬陵學案補遺·楊回光先生天惠〉，頁一百二十下；《氏族譜·楊氏》，頁271–72。

⁹⁵ 范鎮：〈張寺丞文蔚墓誌銘〉，載《宋代蜀文輯存》卷十，頁二十一上至二十二下（總頁166）。

⁹⁶ 張商英：〈張御史唐英墓誌銘〉，載《宋代蜀文輯存》卷十四，頁十二上至十三下（總頁213–14）。

⁹⁷ 《氏族譜·鄧氏》，頁286。

王夢易之子王序與黃庭堅為師友，王序兄王庠婿於東坡之兄，學有淵源。⁹⁸ 王庠早歲上范純仁、蘇轍、張商英書，皆持中立不倚之論，呂陶、蘇轍皆器重之。嘗以《經說》一篇寄蘇軾，為蘇軾所稱賞。王庠與蘇軾、蘇轍、范純仁為知己，呂陶、王吉嘗薦舉，又與黃庭堅、張舜民、任伯雨(眉山任孜之子)相交遊。王庠嘗舉八行，事下太學，大司成考定為天下第一。⁹⁹ 除《經說》外，王庠還有《王庠文集》；王序有《雅歌》、詩賦雜著等。¹⁰⁰

仙井(隆州)李新與王庠交往幾三十年。¹⁰¹ 李新字元應，自號「跨鼇先生」。元祐五年(1090)進士，劉涇嘗薦於蘇軾，命賦墨竹，口占一絕立就。受知於蘇軾。¹⁰² 劉涇出自富於家學傳統的簡州陽安劉氏，號「前溪先生」，以文知名，王安石薦其才。¹⁰³ 李新有《送劉前谿》詩，¹⁰⁴ 表明兩人之交誼不淺。李新有《跨鼇集》存世，同郡人韓駒為李新的文集作序。¹⁰⁵ 《四庫全書總目·跨鼇集提要》云：「其詩氣格開朗，無南渡後啞嘶之音。其文、序、記諸篇，忽排[排]忽散，雖似不合格，而他作亦多俊邁可誦。在北宋末年，可以稱一作者。」¹⁰⁶

韓駒(?-1135)字子蒼，少有文稱，政和初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累官至集英殿修撰。嘗從蘇轍學，又與范祖禹長子范沖交往。¹⁰⁷ 有《陵陽集》，學者稱「陵陽先生」。

馮澥為王夢易夫人向氏撰墓誌銘。馮澥(?-1140)字長源，普州安岳人。父馮山，時稱「鴻碩先生」，嘉祐二年(1057)進士。熙寧末為秘書丞、通判梓州，成都鄧綰薦為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終祠部郎中。有《春秋通解》、《馮安岳集》，劉涇從曾孫劉光祖為其集作序。¹⁰⁸ 馮澥年二十三登元豐

⁹⁸ 馬騏：〈王典孫墓表〉，載《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十一，頁十一下至十二下(總頁789)。

⁹⁹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王庠傳〉，頁11657-58。

¹⁰⁰ 廖世英等：《民國榮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8冊，卷十四〈王商彥墓碑〉，頁十八下至二十一(總頁286-88)。

¹⁰¹ 李新：《跨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一二四冊，卷二十九〈王朝奉〔夢易〕誄〉，頁十七上至十九下(總頁647-48)。

¹⁰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五〈跨鼇集提要〉，頁1343。

¹⁰³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劉涇傳〉，頁13104-5。

¹⁰⁴ 《跨鼇集》，卷一，頁十二下至十三上(總頁428-29)。

¹⁰⁵ 《氏族譜·新繁彭氏》，頁282-83。

¹⁰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五〈跨鼇集提要〉，頁1343。

¹⁰⁷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韓駒傳〉，頁13140-41；韓駒：《陵陽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一三三冊，卷四〈次范元長韻兼簡鄭有功博士〉，頁一上(總頁797)。

¹⁰⁸ 劉光祖：〈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序〉，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十，頁十六下至十七下(總頁895-96)。

進士第，名聲籍甚，紹興三年(1133)以資政殿學士致仕。為文師蘇軾，有《左丞集》。¹⁰⁹

士人學術交遊圈中的藏書家

眉山石氏為藏書世家，號「書臺石家」。¹¹⁰石揚休(995-1057)字昌言，與范鎮同年登科(寶元元年，1038)又同官，故范鎮為其撰墓銘。石揚休喜聚古圖書，有《南郊野錄》、《燕申編》、《角上叢編》、《西齋文集》及詩、雜文、制誥千餘篇。¹¹¹石揚休年十八州舉進士，於數百人中為之首，聲振西蜀。凡四舉進士，皆為選首。司馬光兒時讀書，即聞揚休之名，可見揚休聲名之遠播；但揚休至四十三歲始及第。有趣的是，同時登第者中即有司馬光，兩人均中進士甲科。司馬光從此與石揚休交遊達二十年，直至石揚休逝世。¹¹²

石揚休之子石康伯(1020-?)，字幼安，石康伯舉進士不第，當以蔭補官，亦不就，以讀書賦詩自娛。石康伯獨好書畫，與文同相交如兄弟，得文同畫為多。又與蘇軾為友，亦得其畫藏諸畫苑，並獲蘇軾為其畫苑寫記。石康伯病逝，蘇軾撰文祭之。¹¹³

蜀州閻太古藏書豐富，「刻意於學，酣嗜典冊，顛倒熟爛。尤喜《左氏春秋》，最為學者左右采獲持去精義，以下其他師」。表弟羅致恭從其學，太古授以《左氏春秋》，盡通其學。致恭復以所能，勉勵太古之子頤。閻頤中天聖八年(1030)進士。自讀書便好追訂古聖賢所以立言示後世之意，其為文章，浩蕩閎碩，騰高踔遠，解理析義，夷易明白，「西南士人宗師之」。文同「嘗論文於公之左右」，故與閻頤為講友。¹¹⁴羅致恭「有文行，為西南名人」。致恭悉心培育其子，求名儒為之師友，其子羅登於景祐(1034-1038)中登進士第。文同與羅氏亦有交往，羅致恭逝後，文同應羅登之請，為其父撰銘。¹¹⁵呂陶早年從閻頤學。閻頤「以道德自任，名重一時，與後進少許與」，卻每稱李逢之才，呂陶因而與李逢交往。李逢(?-1075)，蜀州人，登嘉祐二年(1057)進士第，官至著作佐郎，善文辭。¹¹⁶

¹⁰⁹ 《宋史》卷三百七十一〈馮澥傳〉，頁11521-22。

¹¹⁰ 《淨德集》卷二十二〈中大夫致仕石公〔洵直〕墓誌銘〉，頁四下。

¹¹¹ 范鎮：〈石工部揚休墓誌銘〉，載《宋代蜀文輯存》卷十，頁一上至二下(總頁156)。

¹¹²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宋紹興本，卷七十五〈石昌言〔揚休〕哀辭〉，頁545；范鎮：〈石工部揚休墓誌銘〉。

¹¹³ 《蘇軾文集》卷十一〈石氏畫苑記〉，頁364-65；卷六十三〈祭石幼安文〉，頁1948。

¹¹⁴ 《丹淵集》卷三十六〈屯田郎中閻君〔頤〕墓誌銘〉，頁266-68。

¹¹⁵ 同上注，卷三十七〈屯田員外郎羅君〔致恭〕墓誌銘〉，頁271-73。閻頤及其父太古之名見於此銘。

¹¹⁶ 《淨德集》卷二十五〈著作佐郎李府君〔逢〕墓誌銘〉，頁一上至三上；卷二十六〈隴西李君〔平〕墓誌銘〉，頁五下至七上。

閩州新井蒲氏為藏書世家，蒲宗孟曾祖即善藏書，家有藏書樓名「清風閣」。蒲宗孟為仁宗皇祐五年(1053)進士，歷官翰林學士兼侍讀、資政殿學士。神宗稱為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¹¹⁷有《蒲左丞集》、《清風集》等著作多種。蒲宗孟與蘇軾、蘇轍兄弟皆有交往。蘇轍〈寄題蒲傳正學士閩中藏書閣〉詩云：「朱欄碧瓦照山隈，竹簡牙籤次第開。讀破文章隨意得，學成富貴逼身來。詩書教子真田宅，金玉傳家定糞灰。更把遺編觀得失，君家舊物豈須猜。」¹¹⁸

范祖禹與其父范百祉(一作之)曾借閱過蒲氏藏書。范祖禹亦有詩云：「惟昔隱君子，卜築茲考槃。圖書侔藏室，一一手自刊。……來為廊廟重，歸為里閭歡。乃知哲人訓，基構自艱難。我昔侍先君，借書嘗縱觀。題詩尚可記，手澤想未乾。爾來三十載，感事一洑瀾。側身西南望，安得陵風翰。」¹¹⁹

蒲氏與眉山蘇氏及閩中陳氏又有婚姻關係。蘇洵之兄蘇渙於慶曆中任閩州通判，與蒲師道相友，遂結為姻家，蘇渙子蘇不欺娶蒲師道之女、蒲宗孟之姊為妻。¹²⁰蒲師道年二十登天聖八年(1030)進士第，十餘歲能誦經傳，屬詩賦。與蒲氏同州的北宋名相陳堯佐從子陳漸號「金龜子」，以文學名於蜀，一見蒲師道所為詞章，乃以女妻之。¹²¹

上述諸文人學者，圍繞著華陽范氏、眉山蘇氏、梓州文同、成都呂陶，形成縱橫交錯的學術交往關係。另分別與他們交往的文人學者尚多，茲不一一列舉。

慶曆之際，學統四起，¹²²新儒大量湧現，百家爭鳴，學術文化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¹²³四川與之同步，士人家族多崛起於北宋中期，¹²⁴北宋四川最重要的學者，亦都在這個時期產生。上述北宋中期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就包括了所有這些重要學者。正如筆者在本節開始時所言，在這個學術交遊圈裏，居於核心地位之學者是華陽范氏、眉山三蘇父子、梓州文同、成都呂陶。其他重要學者，則有漢州綿竹宇文之邵、閩州閩中鮮于侁、眉山二任(伋、孜)、成都郫縣張愈、隆州仁壽員安輿、漢州綿竹楊繪等。通過對本期士人學術交遊圈的考察，我們對北宋中期四川學術繁榮的情況，當有較為直觀的認識。而從四川的例子可以看出，正是由於各個區域學術文化的發達，才形成了整個北宋中期學術鼎盛的局面。

¹¹⁷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蒲宗孟傳〉，頁10570-72。

¹¹⁸ 《樂城集》卷五〈寄題蒲傳正(宗孟)學士閩中藏書閣〉，頁89。

¹¹⁹ 《范太史集》卷二〈寄題蒲氏清風閣〉，頁七下至八上(總頁99-100)。

¹²⁰ 《淨德集》卷二十七〈靜安縣君蒲氏墓誌銘〉，頁八下至十上。

¹²¹ 蔡襄：《端明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〇九〇冊，卷三十九〈蒲君(師道)墓誌銘〉，頁十七上、下(總頁678)。

¹²² 《宋元學案》卷六〈士劉諸儒學案〉全祖望案語，頁142。

¹²³ 參見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

¹²⁴ 參見鄒重華：〈士族與學術——宋代四川學術文化發達原因探討〉，頁69-82。

兩宋之際之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

由一篇墓誌銘所引出的西川士人學術交遊圈

《金石苑》載有〈李仲侯墓誌銘〉，由前通判巴州李安仁撰，昌州永川縣尉任續書碑，前知潼川府銅山縣文兌篆蓋。¹²⁵李仲侯為綿州巴西人，其祖李哲、父伯誼與文同有交往，其家有學術傳統。李哲之父李鉤博學，以行醫為業，生哲，始令習進士業。李哲博通經史，景祐初就進士舉，試禮部不得，乃歸教其子，伯誼登皇祐五年(1053)進士第。李哲臨終，囑伯誼請文同為其撰銘。伯誼於文無不能，尤長於詩。¹²⁶李仲侯科舉不第，其父勸仲侯姑以蔭入官，以俟後圖。歷官至潼川府司錄遷朝奉大夫。李仲侯負時名，「一時名人學士胥納交出門下」，¹²⁷喜讀書著述，藏書萬卷，有文集、《歸田唱和集》。

李安仁為隆州仁壽人，哲宗元符三年(1100)進士，¹²⁸獲交於李孟侯、仲侯伯仲間，為學術同調。

任續為潼川府(梓州)郫縣人，任氏「世以儒科顯」，「文獻相承，衣冠不絕，蜀人論氏族者推焉」。任續初以父蔭入仕，紹興十三年(1243)任昌州永川縣尉，紹興二十一年(1251)中進士第，選為澧州州學教授，後任開州教授。任續「篤學喜為文」，有《仙雲集》、《任氏春秋》、《春秋五始五禮論》、《篆隸石刻譜》等。任續與南宋著名學者周必大(1126-1204)有同年(進士)之誼，故得周氏為之撰銘。周氏稱其子任義問「博學能文，奧篇隱帙，問無不知，君可謂有後矣」。¹²⁹

文兌為綿州巴西人文正倫子。李仲侯與同縣文正倫、懷安軍金堂蹇汝明、眉山王賞、漢州綿竹李良臣、眉山楊椿有詩文唱和。¹³⁰文正倫字濟道，漢文翁之後，元祐、紹聖間與其弟文正思同學於太學。時「太學諸生三千人，更相甲乙，其推蜀人者中，有二文之目」。文正倫進士出身，為文宏瞻博洽，一時稱之。所著有《左氏綱領》、《東巖野老集》、《小名錄》、《西漢雋永》、《唐史囊括》等。¹³¹

¹²⁵ 載劉喜海(編)：《金石苑》(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第五冊，卷四；又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三十三，頁六上至七下(總頁442-43)。兩處的文字內容多少不同，可參校。

¹²⁶ 《丹淵集》卷三十八〈綿州李處士(哲)墓誌銘〉，頁283-84；李安仁：〈李仲侯墓誌銘〉。李鉤、李哲之名見〈李仲侯墓誌銘〉。

¹²⁷ 李安仁：〈李仲侯墓誌銘〉，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三十三，頁六下(總頁442)。

¹²⁸ 嘉慶《四川通志》卷一百二十二〈選舉志一〉，頁三十四上(總頁3701)。

¹²⁹ 周必大：《文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一四七冊，卷三十四〈恭州太守任君續墓誌銘〉，頁九上至十二上(總頁375-77)。《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僅錄其詩一首，見該書頁173。

¹³⁰ 李安仁：〈李仲侯墓誌銘〉，載《金石苑》，第五冊，卷四。

¹³¹ 蹇汝明：〈文正倫墓誌銘〉，載《金石苑》，第四冊，卷三。

蹇汝明為紹聖中進士，《宋詩紀事補遺》卷三十收有其詩二首，《宋代蜀文輯存》卷三十三有記一篇。另一存世之文，即為文正倫所撰墓銘。蹇汝明稱文正倫「文章如班固」。

王賞為《東都事略》作者王稱之父，王氏乃眉山一個富有學術傳統的家族，以史學傳家。王稱祖輩王朝隱博物洽聞，號「經史笥」。¹³²王賞兄王當博覽古今，嘗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競傳之。於經學尤邃《易》與《春秋》，皆為之傳，得聖人之旨居多。又著有《經旨》、《史論》、《兵書》等。元祐中蘇轍嘗以賢良方正薦。¹³³王賞中崇寧二年(1103)進士第，紹興中曾為實錄修撰，為文師蘇軾，有《玉臺集》四十卷。曾考訂唐、五代及宋朝故實，為《東都事略》作過許多前期工作。王稱承家學，旁搜宋九朝事實，完成《東都事略》。洪邁修四朝國史，奏進其書。其書卓具史識，為考宋史者所寶貴。¹³⁴《四庫全書總目·東都事略提要》云：「宋人私史卓然可傳者，唯稱與李燾、李心傳之書而三，固宜為考宋史者所寶貴矣。」¹³⁵

李良臣於徽宗大觀元年(1107)肄業州學，師從教授蘇元老(蘇軾姪孫)，獲蘇公栽培。¹³⁶李良臣登徽宗政和五年(1115)進士第，紹興中授館職，為尚書郎。¹³⁷今存有詩四首、文五篇及《李良臣文粹》。《四庫全書總目·澹齋集提要》稱李良臣嘗出張浚門下，為所論薦。張浚年十六(政和二年〔1112〕)入漢州學，亦師從蘇元老，登政和八年(1118)進士第。張浚入州學及登第均晚於李良臣，兩人應為同門友，而非師徒關係。紹興七年(1137)六月，宋高宗與張浚談論政事，云：「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近日上殿如李良臣、蒲贊，極不易得。」高宗「因論士人各隨所習，如蜀中之士多學蘇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庭堅」。張浚等人回應說：「大抵耳目所接，

¹³² 吳泳：《鶴林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一七六冊，卷三十四〈王立言墓誌銘〉，頁十七上至十九上(總頁338-39)。

¹³³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王當傳〉，頁12848。

¹³⁴ 陸心源(輯)：《宋史翼》(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二十九〈王稱傳〉，頁三上、三下(總頁1251-52)；陳述：〈東都事略撰人王賞稱父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1分(1939年10月)。

¹³⁵ 卷五十，頁449。王稱從子王養心，早習博學宏詞。養心子王立言承家學，通春秋，雄於文，著有《春秋折衷會解》、《周官說題》、《千金敝帚》、《文章正宗典故》等。為王立言撰銘的梓州中江吳泳云：「君之學問，家有淵源，如浚井得美泉，愈浚而愈不盡。……王氏自嘉祐迄嘉泰〔1056-1204〕，百四十餘年，世稱為文章家。」見《鶴林集》卷三十四〈王立言墓誌銘〉，頁十八上、十八下(總頁338)。

¹³⁶ 李良臣：〈送教授蘇公序〉，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三十五，頁十九下至二十一上(總頁473-74)。

¹³⁷ 《四庫全書總目·澹齋集提要》，《澹齋集》，卷首，頁一上(總頁561)。中華書局1981年版《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七〈澹齋集提要〉(頁1353-54)及該局1997年整理本(卷一百五十七，頁2104)均闕有關李流謙之父李良臣的這段記載。

師友淵源，必有所自。」¹³⁸ 此段對話，表明高宗對李良臣的才幹甚為賞識。而各地的士人，多受當地學術傳統的影響。李良臣和張浚都出自蘇氏後人蘇元老門下。

綿州孫觀國少學於魏城閻實，未冠入太學，從臨邛趙雍學《易》。後從觀國學習之學子所在如市，其門多成立者。工於詩，有文集及《游吳錄》、《龍川筆錄》等。觀國試外省，馮楫識其文，擢殊等。李良臣夫人任氏之外家為孫觀國族人，李良臣平生待觀國如師友，其子李流謙與彭州教授陳大臨（字彥博）少從觀國遊。¹³⁹

李流謙（1123–1176）字無變，號「澹齋」，以父蔭入官。以文學知名，三峽（隆州）喻迪聖「以文豪一世」，讀李流謙所作詩，曰：「此殆唐人之作。」¹⁴⁰ 今存有《澹齋集》。李良臣晚年家於紫巖，「士湊問學」，綿竹章綬（字仲結，？–1167）亦從其學，且為良臣所稱賞之少數學生之一。李流謙描述與章綬之友情曰：「章仲結，予三十年故人也。與之游，如踐芳蓀之畦，香菲菲來襲，人如酌醇醪，竟日陶然而不知醉。」章綬曾祖章彙與楊繪友善，前已述及。其父章鷺特試策第一，賜進士第。章綬侍其父官閬中時，知州為山東名儒梁激，¹⁴¹ 見章綬之詩，「大嗟賞，目為千里駒」。海陵人查匪躬（名許國）「不妄可人，自童時亦喜稱君，於是始以詩名」。¹⁴² 試文翁石室，數出諸生之上，紹興十七年（1147），冠州里之士。於書無所不讀，文章醇深婉約，有作者風，有詩文五十卷。

楊椿（1094–1166）字元老，徽宗宣和六年（1124）省試第一，第進士，歷官秘書少監、兵部尚書兼國子祭酒兼侍講、翰林學士，紹興三十一年（1161）拜參知政事。有文集五十卷，已佚，今僅存文十五篇及《楊椿文粹》。晚宋著名學者楊棟為楊椿族人。

由一篇〈李仲侯墓誌銘〉，引出了一個範圍不少的士人學術交遊圈子。這個圈子既上承北宋中期士人學術交遊圈，又下聯南宋，顯示了宋代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的延續性。在這個學術交遊圈中，我們仍可看到文同和眉山蘇氏的影響。

以譙定為首的東川士人學術交遊圈

兩宋之際的另一個學術交遊圈，是以譙定為首而形成的。譙定字天授，涪陵（今重慶

¹³⁸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卷一百一十一，頁1808。

¹³⁹ 《澹齋集》卷十七〈朝奉大夫知嘉州孫公〔觀國〕墓誌銘〉，頁六下至十一上（總頁74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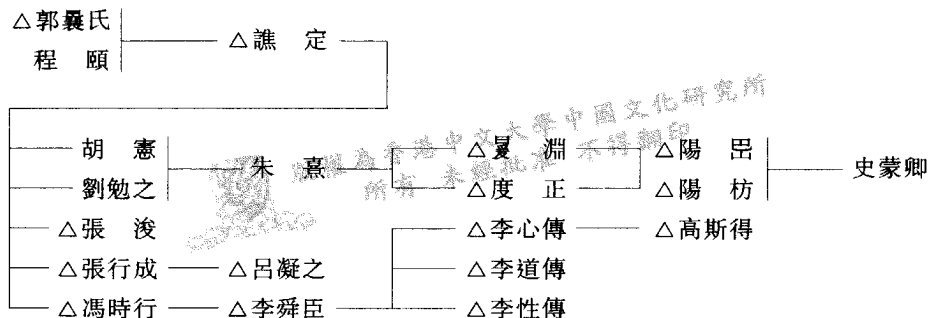
¹⁴⁰ 同上注，附錄，李益謙：〈〔李流謙〕行狀〉，頁一下至二上（總頁760–61）。喻迪聖之名，昌彼德、王德毅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4年）及李國玲編纂《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均闕載。

¹⁴¹ 梁激，《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未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據《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匯編》42冊117頁所收〈梁激題名〉立條，記梁激宣和間以朝請大夫知華州。

¹⁴² 《澹齋集》卷十七〈仲結章君〔綬〕墓銘〉，頁十六上、十六下（總頁754）。《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漏收章綬。查許國精於六經，僑居荆南，開門教授。見《宋元學案補遺》，別附卷一，頁八十三上。

涪陵)人，初學《易》於南平(今重慶南川)人郭囊氏。「郭囊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為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譙定後學於程頤，學行高潔，蜀人敬之曰「譙夫子」。¹⁴³譙定為兩宋之際蜀籍著名學者，理學「涪陵學派」的創始人。¹⁴⁴其學術源流如下表：

表二：譙定學術源流表



注：本表錄自《宋代蜀學研究》頁83，凡有△者為蜀人。呂凝之為筆者所補。

北宋末，欽宗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譙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南宋理學大師張栻之父、綿竹張浚往見再三，定乃開門延入。張浚問所得於前輩者，譙定告之曰：「但當熟讀《論語》。」¹⁴⁵張浚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張浚尤深於《易》、《春秋》、《論語》、《孟子》，有著作多種。

馮時行(?-1163)字當可，恭州璧山人，宣和六年(1124)進士。嘗居縣北縉雲山授徒，因以為號。時行學於譙定，精《易》學，文尤高古，人稱「縉雲先生」。著有《易論》、《縉雲文集》。其學傳於著名史學家李心傳之父李舜臣。¹⁴⁶

張行成為臨邛人，紹興二年(1132)進士，由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丐祠歸，杜門十年，著書七十九卷，上於朝廷，學者稱為「觀物先生」。亦精於《易》，有《周易

¹⁴³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譙定傳〉，頁13460-61；《宋元學案》卷三十〈劉李諸儒學案·徵君譙天授先生定〉，頁620。

¹⁴⁴ 參見《宋代蜀學研究》，頁78-86。

¹⁴⁵ 朱熹：《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明刊本，卷九十五上〈張公〔浚〕行狀上〉，頁1668。

¹⁴⁶ 《宋史翼》卷十〈馮時行傳〉，頁八下至十二下(總頁466-74)；《宋元學案》卷三十〈劉李諸儒學案·知州馮縉雲先生時行〉，頁623-24；《宋史》卷四百五十九〈譙定傳〉，頁13460-61；《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八〈縉雲文集提要〉，頁1363；馮時行：《縉雲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一三八冊，附錄，蹇駒：〈古城馮侯廟碑〉，頁一上至三上(總頁895-96)。

通變》、《周易述衍》、《觀物篇》等著作多種。¹⁴⁷張行成門人呂凝之為成都呂陶第三子緣嗣之子，紹興二十七年(1157)登進士第，以才為茶馬使者，入對又以《易》學受知孝宗，留為太府寺丞。¹⁴⁸著有《易書》四十卷。

宋代四川學術交遊圈多以西川士人為主，譙定之學術交遊圈，卻是以東川人為主的。譙定與門人馮時行為東川人，而門人張浚、張行成則為西川人。張浚之學術交遊關係，則橫跨上述兩個學術交遊圈。譙定的老師家世傳易學，譙定與其門人、再傳弟子亦都精於易學，體現了學術傳承上的一致性。

南宋前期之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

南宋時期，四川學術持續發展，士人學術交遊圈以資州李石、隆州虞氏、華陽范氏、眉州李氏(燾)、隆州李氏(心傳)、漢州綿竹張氏、邛州魏高氏、潼川楊子謨、簡州劉光祖等為主。前期仍以傳統經學、史學為學術發展之主流，中期以後，理學成為主流。

南宋前期之士人學術交遊圈，基本上是以資州李石為主而形成的，華陽范氏、眉山蘇氏仍扮演著重要角色。

李石(1108-?)字知幾，號「方舟」，登紹興二十一年(1151)進士乙科。李石曾任太學博士，改任成都學官，出主石室，學生至一千二百人。¹⁴⁹鄧椿《畫繼》稱其出主石室，就學者如雲，閩越之士萬里而來，刻石題諸生名幾千人，蜀學之盛，古今鮮儷。¹⁵⁰李石藏書豐富，博學而精經術，著述頗多，為南宋四川著名學者。

李石與華陽范氏有很深的交往，他在為范漑所撰的墓誌銘中談到與范氏的關係云：「石蚤客於范氏，獲交其群從子弟。」與范漑、范仲黼父子「蓋數世之交，且斯文相與不薄」。¹⁵¹范漑為范百祿之孫、范祖述之子。范漑子范仲黼久從李石學，這表明李石曾受聘為范氏家庭教師。後范仲黼從張栻學，成為南宋晚期著名理學家。范鎮曾孫范圭(字元功)，生於許，靖康元年(1126)被金人俘往北方，以其為是年拔解有名進士，而與宇文虛中等受到優待。范圭後輾轉逃歸成都，與李石等為文友，詳下述。

¹⁴⁷ 《宋史翼》卷二十八〈張行成傳〉，頁三下至九上(總頁1210-21)；《宋元學案》卷三十〈劉李諸儒學案〉，頁624；卷七十八〈張祝諸儒學案·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頁1480-81。

¹⁴⁸ 《宋元學案》卷七十八〈張祝諸儒學案·太府呂先生凝之〉，頁1481；《氏族譜·呂氏》，頁262-63。

¹⁴⁹ 李石：《方舟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一四九冊，卷十〈自敘〉，頁二十二下至二十五下(總頁646-47)。

¹⁵⁰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八一三冊，卷三，頁十二下至十三上(總頁516)。

¹⁵¹ 《方舟集》卷十五〈范叔源〔漑〕墓誌銘〉，頁十二上至十三下(總頁700)。

李石與眉山蘇氏亦相交深，與蘇軾孫蘇符（軾長子蘇邁之子）、蘇籍（軾幼子蘇過之子）、曾孫蘇嶠都有交遊，其子李開（1131-1176）為蘇嶠（蘇籍兄蘇籥之長子）所知。¹⁵² 李石《方舟集》中有為蘇嶠所作〈蘇文忠集御序跋〉（卷十三），《四庫全書總目·方舟集提要》稱其「文字淵源出於蘇氏」，「諸體詩縱橫跌宕，亦與眉山門徑為近也」。¹⁵³ 李石為眉州彭山程揆所撰〈資州程使君〔揆〕墓誌銘〉云：

凡〔程揆〕向之以文字往來者，如大蘇尚書公符、小蘇博士公籍、喻駕部汝礪、運副范公瓚、檢討邵公博。石與使君日處其間，其諸公之群從子弟、執門生弟子禮者，多名人，日沓沓說文不離口。而所得於淵源有自者，未論其人，文可知也。¹⁵⁴

又為范圭所撰〈范元功墓誌銘〉云：「方元功西歸，石亦客成都。時蘇子籍、程子揆、王子灼、譚子拂雲與石群從多俊人，日夕文字往來。或頃不見，折簡遣人，杯酒相鉤。」¹⁵⁵

范圭與蘇籍相交遊，范祖禹長孫范仲芑（范冲子）為蘇符侄婿。¹⁵⁶ 范、蘇兩家之交誼，至南宋仍然延續。

程揆（1104-1164）祖先於唐末入蜀，家眉州彭山，為眉之聞家。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祖父程沂以經學教授犍為，因為犍為人。宣和初入太學，受知於太學博士眉山孫逢。程揆登建炎二年（1128）進士第，歷任潼川府、成都府學教授，知昌州、資州等。有《文集》、《通鑑發揮》、《春秋外傳》、《尚書外傳》、《史評》、《雜誌》、《佛心印》等著作。程揆不僅在成都時與李石等日夕以文字往來，程揆知資州，李石通判彭州，依然「書問不間斷如昨」。程揆病重時囑其子，必欲得李石為其銘，兩人相交可謂深矣。而程揆第三子師夔又從李石學經。¹⁵⁷

喻汝礪（?-1143），仁壽人，崇寧五年（1106）賜學究出身，自號「捫膝先生」。¹⁵⁸ 工詩文，著有《捫膝先生文集》。簡州劉光祖為其集作序云：「先生之於學不古不好，於文不古不嗜，於事不古不愜，故其於名節不古不止也。……蓋先生之文，一字不

¹⁵² 同上注，卷十七〈小舟〔李開〕墓誌銘〉，頁四下至七下（總頁727-28）。

¹⁵³ 卷一百五十九，頁1370。

¹⁵⁴ 《方舟集》，卷十六，頁十七下（總頁716）。

¹⁵⁵ 同上注，卷十五，頁二十下（總頁704）。

¹⁵⁶ 蘇山：〈蘇符行狀碑〉，載高文、高成剛：《四川歷代碑刻》（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84-85。碑文由蘇符子蘇山撰文，侄婿蜀郡范仲芑書。

¹⁵⁷ 《方舟集》卷十六〈資州程使君〔揆〕墓誌銘〉，頁十七上至二十上（總頁716-17）；卷十五〈范元功〔圭〕墓誌銘〉，頁十九上至二十一上（總頁703-4）。

¹⁵⁸ 《宋史》卷四百五十三〈孫逢傳〉附，頁13330；《宋代蜀文輯存》，作者考，頁十一下至十二上（總頁32）；《宋史翼》卷八〈喻汝礪傳〉，頁三下至十一上（總頁376-91）。張邦昌僭立，有司趣百僚入賀。汝礪時任祠部員外郎，與程揆恩師太學博士孫逢獨不入賀，捫其膝曰：「不能為賊臣屈。」遂掛冠去。

肯苟於下筆，每篇率能馳騁上下，濤起阜湧，力有餘而氣不竭，辭既工，於理與事又欲明白而深切。」¹⁵⁹

范瓚生平不詳。邵博(?-1158)為邵雍孫、邵伯溫次子，曾知果州、眉州，卒於犍為縣。¹⁶⁰

王灼字晦叔，號「頤堂」，遂寧人。¹⁶¹著有《糖霜譜》、《碧雞漫志》、《頤堂詞》、《蔬食譜》、《頤堂先生文集》等。紹興十五年(乙丑[1145])冬，王灼客居成都碧雞坊，¹⁶²與李石等交遊，當在此時。今存《頤堂先生文集》卷五中，有〈次韻李知幾[石]〉、〈答李知幾〉等詩。王灼與許多士人有詩唱和，可知其交遊是相當廣的。紹興九年(1139)，王灼為夔州鈴轄安撫司幕府官，邛州李亮、李防兄弟，以其父李頤之命遊學吳中，來扣門求交。可見王灼當時頗負名望。¹⁶³

成都雙流李嘉謀兄弟皆從李石學。¹⁶⁴李嘉謀與其弟嘉猷同中乾道二年(1166)進士第，與李心傳之父李舜臣同科。嘉謀博通經子百氏而深於《易》，世號「息齋先生」，其弟嘉量(1160-1224)從其學。李氏與成都宋氏、成都句氏、簡州陽安劉氏、邛州蒲江魏氏等學術家族有婚姻親戚關係。

簡州陽安劉氏為學術世家。¹⁶⁵族人劉伯熊號「東溪先生」，為資州李石門人，精於《易》，為李石編〈易十例〉、〈略互體例〉、〈象統左氏卦例〉、〈詩如例〉、〈左氏君子例〉、〈聖語例〉、〈詩補遺〉諸篇。¹⁶⁶自著有《東溪易傳》、《東溪先生集》，南宋著名學者葉適為其集作序。族親劉光祖(南宋名臣、名學者)少從其學，故劉光祖為李石再傳弟子。劉光祖著有《續東溪易傳》，朱熹與劉光祖書云：「《東溪語說》伏讀再三，乃知師友淵源所自，深遠如此。」¹⁶⁷

¹⁵⁹ 劉光祖：《捫膝先生文集序》，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十，頁十三下(總頁894)。該文集已佚，僅有文十六篇、詩三十二首傳世。

¹⁶⁰ 《宋史翼》卷十〈邵博傳〉，頁十六下至十七上(總頁482-83)。

¹⁶¹ 王灼：《頤堂先生文集》，《四部叢刊續(原書誤作三)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卷末跋。

¹⁶² 王灼：〈碧雞漫志序〉，載《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十三，頁九下至十上(總頁810)。

¹⁶³ 王灼：〈李教授[亮]墓誌銘〉，載解縉等(纂修)：《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影印線裝本，1960年)，卷一萬四百二十一「李」字引王灼《頤堂集》，頁十三上。李氏兄弟入臨安上庠學習，紹興十二年(1142)，王灼被檄至臨安，李氏兄弟續從王灼遊。李氏兄弟以勤學聞名，「吳中士大夫以是盛稱蜀二李」。李亮(1104-1152)登進士第，終綿州學教授。《方舟集》卷十七〈龐氏母墓誌銘〉，頁十一下(總頁730)。

¹⁶⁵ 參閱鄭重華：〈「鄉先生」——一個被忽略的宋代私學教育角色〉，頁151及注58。

¹⁶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九〈方舟集提要〉，頁1370。

¹⁶⁷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十九〈蘇氏蜀學略補遺·劉東溪先生伯熊〉，頁一百四十四下；葉適：《水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明刊本，卷十二〈東溪先生集序〉，頁139-40。

臨邛李僑早從李石、寂通先生宋興遊，其父卒，諸弟事李僑如師。其弟李民彝早登第，李僑肆力於學，晝誦夕惟，凡十有六年。為劉光祖提拔於類省試，遂登紹興四年(1193)進士第，時年五十四歲。初釋褐即乞致仕，退居鄉里，號「枕流居士」。前後鎮蜀者，率致書幣，諂以闕失。¹⁶⁸

綿州馮誠之(1143-1206)號「復庵先生」，曾師事李石、史楠、李叔獻，與劉儀鳳、黃鈞、陳損之、章森、李崑等為友，蜀中名士楊子謨、虞剛簡皆願交焉。北宋末，其祖父馮汝舟以太學上舍生同陳東上書論時政，請斬六賊，後在應天府勸高宗即位，廷叱王時雍，名噪一時，與張浚為至交。馮誠之三兄皆登進士第，而誠之屢舉不第，乃著書授徒，從遊者數百人。嗜周程子書，有《復庵讀論語》、《詩解》、《書傳》、《易英》、志銘贊記詩文五十卷等。誠之以累舉恩入仕，任江油縣尉，魏了翁岳父楊熹為龍州守，首加論薦。魏了翁守潼川日，誠之子馮甲為了翁下屬。¹⁶⁹

劉儀鳳(字韶美，1110-1175)為普州人，紹興二年(1132)進士。少以文謁左丞馮澥(見上文「北宋中期之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一節)，澥甚推許，遂知名。趙奎以「富有詞華，恬於進取」向朝廷薦舉劉儀鳳，遂入朝任職，所草牋奏，以典雅稱。儀鳳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好蓄書，凡萬餘卷。¹⁷⁰ 前述李石講友王灼，亦與劉儀鳳為友，其殘存之《頤堂先生文集》中，有〈次韻韶美義夫兩家舉孫〉和〈九日同韶美誼夫登妙明分韻得光字〉詩二首。¹⁷¹

黃鈞字秉仲，綿竹人，治詩，登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第，歷任館閣之職。與張栻有「鄉曲之契」，「意好特深」。¹⁷²

陳損之，隆州籍縣人，乾道二年(1166)進士，歷任館閣之職。章森為廣漢人，淳熙十五年(1188)以敷文閣待制知建康府，官終吏部尚書。¹⁷³

史楠、李叔獻、李崑生平不詳。楊子謨與虞剛簡為南宋中晚期士人學術交遊圈中核心和重要成員，參見下述。

在這個學術交遊圈中，除李石本人和劉儀鳳為藏書家以外，李石另有兩位藏書家朋友。彭州藏書家趙樗年與李石為文字之友。趙樗年長於《春秋》，其說破凡例傳注，以尊聖人之經。又精於古律詩，多奇語，至其他文，皆有法，有《趙樗年集》。其子趙恕以《春秋》世傳其學。¹⁷⁴

¹⁶⁸ 《鶴山集》卷七十三〈李公(僑)墓誌銘〉，頁591-92。

¹⁶⁹ 同上注，卷七十九〈江油縣尉馮君(誠之)墓誌銘〉，頁647-49。

¹⁷⁰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劉儀鳳傳〉，頁11940-41。

¹⁷¹ 分見卷二，頁十上；卷三，頁五下至六上。

¹⁷² 張栻：《南軒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一六七冊，卷四十三〈祭黃侍郎仲秉〉，頁七下(總頁772)。

¹⁷³ 參見《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3冊，頁2631，2078。

¹⁷⁴ 《方舟集》卷十六〈忠州文學趙君(樗年)墓誌銘〉，頁二十四下至二十五下(總頁719-20)。

普州樂至藏書家馮知微之長子馮懋與李石為友，李石主成都府學，生徒負笈至千人以上，馮懋時為錢糧官，乃大力給予物質支持。知微幼子馮恕則入成都府學為李石學生。¹⁷⁵

《宋元學案》未收李石，《宋元學案補遺》將其補入，列為蘇符（仲虎）門人。由上引李石為程揆、范圭所撰墓銘，可知李石與蘇符、蘇籍實為講友，而非師徒關係。以李石為核心，聯同華陽范氏、眉山蘇氏，形成南宋前期四川最具影響力的士人學術交遊圈。其學術內容，以經學、文學為主。以李石之學術地位和影響，應可單列為一學案，名之曰「方舟學案」。

南宋中晚期之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

以「二江九先生」為中心的士人學術交遊圈

本期的士人學術交遊圈，首當提到的是「二江九先生」。虞剛簡與華陽四范（范仲黼、范蓀、范子長、范子該）、薛紱、程遇孫、宋德之、鄧諫從在成都講學，皆傳綿竹南軒先生張栻之學，影響很大，被稱為「二江九先生」。四范與宋德之為張栻門人，虞氏等四人則為南軒私淑。圍繞著他們，形成了一個範圍頗廣的學術交遊圈子，范仲黼與虞剛簡為其核心人物，尤以虞剛簡的交遊關係最廣。

虞剛簡（1164–1227）字仲易，一字子韶，隆州仁壽人，南宋名相虞允文孫，南宋蜀籍重要理學家，蜀人師尊之，稱「滄江先生」。虞剛簡為資州趙雄（南宋宰相）之婿，趙雄子趙昱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為師，又私淑張栻。虞剛簡從趙昱得周、程等諸子之學，「因知學統所在」。¹⁷⁶ 虞剛簡居官華陽，又得與華陽范氏之范仲黼、范蓀、范子長、范子該及李修己、張士佺、薛紱、程（原寫作陳）遇孫、李心傳、李道傳、宋德之、鄧諫從等相與切磋義理之學。魏了翁試吏佐四川幕府，與虞剛簡「傾蓋如故交」。潼川楊子謨與虞剛簡論《易》，繇是定交。虞剛簡與魏了翁之仲兄高稼、簡州陽安劉光祖、眉州丹陵李暹亦有交往。這樣，虞剛簡與多數南宋中晚期的蜀籍重要學者，都建立了學術聯繫。

虞剛簡自上華陽，築室於成都之合江，以成其祖虞允文卜居未遂之志。范蓀為榜曰「滄江書院」。虞剛簡潛究六經於其室，於《易》尤為精詣，參貫融會理學諸子之說，學問大進。張栻門人、曾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嘉定元年至二年〔1208–1209〕）的長沙人吳獵謂人曰：「湘中胡（宏）張子（栻）流風所被，而得其學若此者鮮。」虞剛簡在滄江

¹⁷⁵ 同上注，卷十五〈馮主簿〔知微〕墓誌銘〉，頁二十二上至二十三下（總頁705）；《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十九〈蘇軾蜀學略補遺·馮先生恕〉，頁一百四十八上、四十八下。

¹⁷⁶ 《宋元學案》卷七十二〈二江諸儒學案·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頁1364；卷五十〈南軒學案〉，頁930。

書院會友講學，「士之請益者，肩摩袂屬，謁無留門，坐無虛席，爨無停炊。自二十年來，知與不知，皆曰『滄江先生』」。卒之日，蜀之士民塗泣巷弔，學於成都者二百餘人聚哭於滄江書院。李稟為文弔之曰：「天稟超軼之才，世傳經濟之學。」¹⁷⁷ 虞氏之學術影響，於此可知矣。著作有《論語解》、《易說》、《詩說》、《永康軍圖志》及文集等，但都散佚不存，其學術成就已無從得知。

范仲黼為李石門人，前已述及。仲黼登孝宗淳熙五年(1178)進士第，仕至國子博士兼皇姪許國公府教授，學者稱「月舟先生」。初，張栻雖為蜀人，而居湖湘，其學未甚通於蜀。范仲黼始從張栻學，杜門十年，不汲汲於進取。晚年與虞剛簡等講學成都二江之上，「南軒之教，遂大行于蜀中」。魏了翁謂其剖析精微，羅絡隱遁，直接五峰(胡宏)之傳；朱熹與呂祖謙皆推敬之。¹⁷⁸ 范仲黼為南宋重要理學家，但卻無著作留傳下來，連他著過何書都不清楚，其學術已無從窺知，今僅存詩一首。¹⁷⁹ 范子長、子該兄弟為仲黼從子，范蓀世系未詳。范子長以進士官太學，范子該與兄同遊張栻之門，與陳亮為友。范子長有《格齋集》、《皇州郡縣志》，范蓀著有《五代史正誤》，二人在傳播理學之餘，仍保持了范氏的家學傳統——史學。

黃宗義云，范仲黼、范蓀從張栻學，皆陳概倡導之功。陳概為隆慶府普成(今四川劍閣南)人，字平甫，乾道進士。對策慷慨，張栻之友魏掞之讀而奇之，¹⁸⁰ 告以「君鄉有張敬夫(栻)者，醇儒也」。陳概遂以書信向張栻問學，與兄栗同刻志於聖賢之道。「淳熙、嘉定而後，蜀士宵續燈，雨聚笠，以從事于南軒之書，湖湘間反不如也。然則平甫之功大矣！」¹⁸¹

與陳概同縣的黃裳，嘗與陳概兄弟講學論道，間接薰染到張栻之學。¹⁸² 黃裳(1146-1194)字文叔，號「兼山」，累官太學博士、嘉王府翊善、禮部尚書兼侍讀。精經術，有《王府春秋講義》、《兼山集》、《兼山家學》、《樂記論》等，為著名學者。¹⁸³ 黃裳又是傑出的天文學家，所繪天文圖譯成多國文字，得到李約瑟等世界科學史名

¹⁷⁷ 《鶴山集》卷七十六〈虞公〔剛簡〕墓誌銘〉，頁624。

¹⁷⁸ 《宋元學案》卷七十二〈二江諸儒學案·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頁1363；《鶴山集》卷八十六〈蘇和父〔在鎔〕墓誌銘〉，頁711。

¹⁷⁹ 收入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臺北：鼎文書局，1971年)，卷五十四，頁七下至八上(總頁2342-43)。

¹⁸⁰ 魏掞之(1116-1173)字元履，建州建陽(今福建建陽)人，師胡憲，與朱熹遊，人稱「艮齋先生」。見《宋史》卷四百五十九〈魏掞之傳〉，頁13468-69。

¹⁸¹ 《宋元學案》卷七十二〈二江諸儒學案·進士陳平甫先生概〉，頁1362；《南軒集》卷十三〈潔白堂記〉，頁三上至五下(總頁531-32)。

¹⁸²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黃裳傳〉，頁12006。

¹⁸³ 樓鑰：《攻媿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武英殿聚珍版本，卷九十九〈黃公〔裳〕墓誌銘〉，頁956-63。

家的高度評價。¹⁸⁴黃裳曾作過鄉先生，著名學者和藏書家、青神楊泰之少從其學。黃裳與劉光祖為友，其行狀即為劉氏所撰。

宋德之為蜀州人，擢慶元二年(1196)外省第一，為南宋名臣。¹⁸⁵著有《青城遺稿》，並與程遇孫等彙編《成都文類》。

薛紱為龍游(今四川樂山)人，淳熙十一年(1184)進士，於書無所不讀，學者稱「符溪先生」。薛紱知黎州時，築玉淵書院以講學。曾任成都教授，召為祕書郎。所著有《易則》，皆談《易》理，魏了翁自以為不及。

程遇孫與虞剛簡同為仁壽人，累官太常寺丞、潼川漕使。少年雄於文，已而折節為南軒之學。嘗參與彙編《成都文類》。

鄧諫從為漢嘉(今四川雅安)人，嘗通判黎州。

李心傳、道傳兄弟出自隆州井研史學世家，毋庸贅述。

李修己為豐城(今江西豐城)人，乾道進士，從朱熹、張栻遊，有《李成州集》。通判成都府，值范仲黼等講學於此，乃與張仕佺參與其事。張仕佺為劍浦(今福建南平)人，張栻高弟，大概亦因任官而居成都。¹⁸⁶

資州人張方，亦參與范、虞等人之講學活動。張方為慶元五年(1199)進士，官簡州教授，入為國子監正轉太常博士，歷知邛、眉、果等州。學者稱為「亨泉先生」，有《亨泉遺稿》等著作。魏了翁與張方為友，極重之。¹⁸⁷

虞剛簡與魏了翁交誼尤深，剛簡曾孫、元代大學者虞集述及曾祖與魏了翁等之關係云：

如劉後溪〔光祖〕、楊浩齋〔子謨〕、張亨泉〔方〕、魏鶴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某曾大父友誼最厚。……而鶴山公則東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者也。¹⁸⁸

劉光祖出自富於學術傳統的簡州陽安劉氏，其族祖「前溪先生」劉涇為北宋中期學術圈中之人，與蘇軾和「跨鼇先生」李新相友，族親劉伯熊為李石門人。劉光祖為南宋名臣和著名學者，其學問為張栻、朱熹所稱賞，又與張栻弟子、眉州丹稜李壁、

¹⁸⁴ 參見劉復生：〈宋代四川科學技術的發展〉，載《宋代蜀學研究》，頁336-60。

¹⁸⁵ 《宋史》卷四百〈宋德之傳〉，頁12155-57。

¹⁸⁶ 以上均參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十二〈二江諸儒學案補遺〉；《宋元學案》卷七十二〈二江諸儒學案〉。

¹⁸⁷ 《宋元學案》卷七十二〈二江諸儒學案·提刑張亨泉先生方〉，頁1366；《宋史翼》卷二十二〈張方傳〉，頁九下至十下(總頁958-60)；《鶴山集》卷九十一〈哭張義立〔方〕提刑郎中〉，頁760。

¹⁸⁸ 虞集：《道園學古錄》，《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明刊本，卷十〈題趙祕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頁106。

李暉兄弟及魏了翁等致力彌合洛蜀之爭。¹⁸⁹ 劉光祖與許多蜀籍學者有交往關係，是南宋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中的重要成員。惜劉氏長達一百卷的《後溪集》已佚，他與許多學者交往關係的詳情已無從知道了。

楊子謨(1153-1226)字伯昌，潼川(梓州)人，蜀中名學者，人稱「浩齋先生」。父楊知章，該累舉恩，不復仕，自號「雲山老人」。楊子謨既冠，時周程子諸書雖傳於蜀，卻流傳未廣。楊知章遊廣漢，得張栻之學，以授子謨。淳熙八年(1181)廷對策，孝宗嘉其直，擢貢甲科(第八)。歷綿州廣安軍、成都府教授，皆以義理訓迪諸生。「成都學官蓋四蜀之士咸在，公之餘論，漸被滋廣」。主四川類省試事兼監試事，以取文之要五、校士之目七示同事者，「大要先義理而後文采，虛心從眾而不斷以己見，且專以論策定去取」。蜀帥楊輔遂以「五要七日」闡上，且刻諸試院，以為取士之標準。楊子謨曾於家鄉鄆縣南山築室聚友，號「雲山書院」。退休後，「即雲山書院講授後進，吉月、月半誦《論》、《孟》、《中庸》、《大學》，語或至旰，聽之者各充然有得」。¹⁹⁰ 有《浩齋退稿》，魏了翁為其集作序，稱楊子謨「經德守道，行為世師，……雖不及登張子〔栻〕之門，而師友淵源實自之」。¹⁹¹ 楊子謨與李燾子李壁亦有交往。

以「二江九先生」為中心的士人學術交遊圈，其特別之處，在於一班頗有學養、志同道合的學者因聚集講學而形成學術交遊圈的核心。他們或受教，或私淑，皆傳理學大師張栻之學，為理學在蜀中的廣為流傳及追上發達地區的水準作出了重要貢獻。南宋晚期兩位理學代表人物之一的魏了翁，即是從這個學術圈中培育出來的。

南宋中晚期的蜀籍重要學者如隆州井研李心傳、李道傳兄弟、簡州陽安劉光祖、梓州楊子謨等，也都捲入這一學術圈中。令人惋惜的是，這個學術圈中學者的著述大多散佚不存，像虞剛簡、范仲黼、劉光祖、楊子謨等當時著名的學者，如今的學術史已無法為他們寫下應有的篇幅了。

華陽范氏在「二江九先生」中佔四位，這個家族活躍於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中並居於重要地位，自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晚期，綿延不絕。

以魏了翁為中心的士人學術交遊圈

「二江九先生」之外，以魏了翁為中心，形成了另一個士人學術交遊圈。

魏了翁(1178-1237)字華父，邛州蒲江人，慶元五年(1199)進士，官至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為南宋晚期著名理學家，與真德秀齊名。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古今考》、《國朝通典》、《師友雅言》等著作多種。魏氏與蒲江高氏有著密切之婚姻及過繼承嗣關係。了翁與其親兄高載、高稼、高崇、高定子及從弟魏文翁、從子高斯得先後登第，了翁與高定子、高斯得均官至執政，家勢可謂盛極一時。

¹⁸⁹ 參見《宋代蜀學研究》，頁111-16。

¹⁹⁰ 《鶴山集》卷七十四〈楊公〔子謨〕墓誌銘〉，頁604-7。

¹⁹¹ 同上注，卷五十五〈楊伯昌浩齋集序〉，頁471。

胡昭曦撰〈詩書持家，理學名門：宋代蒲江魏氏家族研究〉，¹⁹²對魏高氏家世及學術作了深入細緻的探討。蔡方鹿《魏了翁評傳》一書，¹⁹³集中討論了其理學思想。本文之重點，則是魏了翁的學術交遊關係及由此形成之士人學術圈子。

魏了翁初志於學，由「二江九先生」之范子長、子該兄弟及薛紱以得門戶，其後始友朱熹門人李公晦（方子）、輔潛庵（廣）。¹⁹⁴繆荃孫《魏文靖公年譜》云，魏了翁二十歲時，受教於「二江九先生」之另一位學者、知邛州范蓀。¹⁹⁵寧宗嘉泰時（1201–1204），魏了翁與范子長、宋德之都任職朝中，有同僚之誼。¹⁹⁶魏了翁與薛紱交，薛紱逝後，了翁撰〈哭薛秘書（紱）文〉以祭之。¹⁹⁷魏了翁與虞剛簡之關係，已見前述。

魏了翁長兄高載字東叔，通六學，尤精於毛氏《詩》，旁及子史百氏、異端小說，登嘉泰二年（1202）第。調瀘州錄事參軍，簡州許奕為知州，相處融洽。范子長繼任之，高載治任將歸，范氏挽留於幕府，「主賓從容，惟孜孜講學之務」。范子長即郡齋修地理書，以高載為主，輔以劉湜、史堯輔。¹⁹⁸《宋史·藝文志》史類記有范子長《皇州郡縣志》一百卷，當即委付高載所修之地理書。惜其書已佚。¹⁹⁹此外高載尚著有《通鑑巨編》。全祖望稱高載為范氏門人，²⁰⁰實應為范子長講友。史堯輔與魏了翁等相知，詳後。

魏了翁三兄高崇（1173–1232）字西叔，嘉定七年（1214）進士。為眉山縣尉，故參知政事李壁方家居，「二江九先生」之一的宋德之為眉州知州，高崇從之遊。參與過「二江九先生」講學活動的張方繼知眉州，尤敬禮高崇。高崇有《周官解》、《經史雜議》若干卷。²⁰¹

¹⁹² 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頁239–61；另收入胡昭曦：《胡昭曦宋史論集》，頁320–50，略去世系表。

¹⁹³ 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

¹⁹⁴ 《宋元學案》卷七十二〈二江諸儒學案〉范子長、子該合傳（頁1363）及卷八十〈鶴山學案〉黃百家案語（頁1499）引《宋史·魏了翁傳》，均誤記李方子為李敬子（名燾）。參見《鶴山集》卷三十五〈答朱擇善（改之）〉，頁307；卷五十四〈朱文公年譜序〉，頁459–60。

¹⁹⁵ 煙畫東堂本。轉引自胡昭曦：〈詩書持家，理學名門：宋代蒲江魏氏家族研究〉，頁251；《胡昭曦宋史論集》，頁335。

¹⁹⁶ 《鶴山集》卷五十九〈跋宋常丞（德之）送行詩後序〉，頁490。

¹⁹⁷ 同上注，卷九十一，頁754–55。

¹⁹⁸ 同上注，卷八十八〈高君（載）行狀〉，頁731–33。

¹⁹⁹ 《蜀中廣記》卷九十六記為《瀘州地理書》，大概是據「范公即郡齋修地理書」一句而推之，以為修的是瀘州的地理志。但據高載行狀，應為全國性的地理總志。

²⁰⁰ 《宋元學案》卷八十〈鶴山學案·知縣高先生載〉，頁1511。

²⁰¹ 《鶴山集》卷八十八〈高公（崇）行狀〉，頁733–36。

范仲黼弟子蘇在鎔與魏了翁交，蘇在鎔(1153-1234)較魏了翁(1178-1237)年長二十餘歲，故了翁稱其為忘年友人。蘇在鎔字和父，其先為簡州陽安人，後遷郫，為著姓。年三十一與鄉舉，年五十六始登進士第。蘇在鎔早年淹貫諸子百家，旁及老釋二氏，旁搜博採，晚而斂博歸約，落華就實。退居七年，諸公要人，造門請益，講學不斷。臨終，以五峰先生(胡宏)遺文授其幼子蘇子禮曰：「此吾從月舟先生〔范仲黼〕得之，吾手自讎校，汝可細觀，當自得之。」²⁰²

成都宇文紹節為蜀士最早從學於張栻者，故〈二江諸儒學案〉列之為首。宇文紹節(?-1213)字挺臣，號「顧齋」。為宇文虛中孫、師瑗子。登進士第，累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²⁰³魏了翁述其與宇文紹節之關係云：「某景以諸生，受知於公，他日又得侍同朝，甚喜。」²⁰⁴魏了翁與綿竹房宇文之邵的五世孫宇文史午、從弟宇文公詣相友，應其請，為宇文之邵文集撰序。²⁰⁵

全祖望〈程氏春秋分記序〉云：「眉人程克齋〔公說〕兄弟並遊于宇文之門，而克齋之學最醇。」²⁰⁶程公說(1171-1207)字伯剛，號「克齋」。教其弟公碩學，二人同年舉進士，既仕，俱以所學質於劉光祖。公說其先本丹陵程氏，六世祖自汴歸蜀，居敘州宣化。公說積學苦志，平生精研《春秋》，服膺伊洛諸書，有《春秋分紀》、《左氏始終》、《左氏通例》、《左氏比事》、《語錄》、《士訓》、《詩文》、《程氏大宗譜》等著作多種，僅《春秋分紀》存，收入《四庫全書》中。公說另一弟公許，舉嘉定四年(1211)進士。為文才氣磅礴，有著作多種，今殘存有《滄州塵缶編》十四卷，收入《四庫全書》。²⁰⁷公說之母出身於眉山著名的藏書世家「書樓孫氏」。

魏了翁與梓州中江吳之巽(1160-1221)相知深。吳氏富家學傳統，吳之巽雖未中第，學問卻頗深厚。吳之巽受小戴氏書於其父，著述頗豐，於歷代史書，凡數四讎校，於國朝故實、天文地理、字書罔不精治。為文沈涵有雅致，有《諸經講義》、《中庸口義》、《通鑑類編》、《國典》等。吳氏以儒學傳家，自入蜀四世孫吳行真、吳行軫登進士第以後，科宦不斷。魏了翁云：「吳氏累世登科，至君兄弟，為學益力，竟齋志以死。然自淳熙至今，一門以儒學顯，凡與鄉賦〔試〕者十有二，第進士者五人，里人榮之。」²⁰⁸吳之巽長子中孚登寧宗嘉定十年(1217)進士第。

²⁰² 同上注，卷八十六〈蘇和父〔在鎔〕墓誌銘〉，頁711；《宋元學案》卷七十二〈二江諸儒學案·常幹蘇先生在鎔〉，頁1369。

²⁰³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宇文紹節傳〉，頁12116-17。

²⁰⁴ 《鶴山集》卷九十一〈哭宇文樞密〔紹節〕文〉，頁752。

²⁰⁵ 同上注，卷五十五〈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頁467。

²⁰⁶ 《宋元學案》卷七十二〈二江諸儒學案·教授程克齋先生公說〉，頁1367。

²⁰⁷ 劉光祖：〈臨邛教授程伯剛〔公說〕墓誌銘〉，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十，頁十八上至十九下(總頁896-97)；《宋史》卷四百十五〈程公許傳〉，頁12454-59。

²⁰⁸ 《鶴山集》卷七十二〈中江吳先之〔之巽〕墓銘〉，頁585。方括符中字據四庫本改。

南宋名臣吳泳、吳昌裔兄弟即出自中江吳氏。吳泳字叔永，號「鶴林」，嘉定元年(1208)進士，累官至權刑部尚書兼修玉牒、寶章閣學士，為南宋名臣，有《鶴林集》傳世。吳泳弟昌裔(1183-1240)為嘉定七年(1214)進士，歷官監察御史、集英殿修撰、寶章閣待制。習程頤、張載、朱熹諸書，任眉州教授時，揭白鹿洞書院學規以教，士習丕變。熟於典章，嘗輯至和、紹興諸陳奏議本末，名為《儲鑑》。又會萃周、漢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又有《格齋文集》、《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紀聞》、《容臺議禮》等。²⁰⁹ 吳泳與游似、牟子才等皆為蜀之名士，均造了翁門受業。²¹⁰

游似為南充人，嘉定十四年(1221)進士。游似歷館閣之職，官至宰相、觀文殿大學士，進爵國公。²¹¹ 其父游仲鴻(1138-1215)登淳熙二年(1175)進士第，為宰相趙汝愚所器重，其氣節為朱熹所稱賞，曰：「信蜀士之多奇也。」簡州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²¹² 仲鴻有《鑑虛集》，魏了翁於嘉泰三年(1203)與游仲鴻相識，後為其集作序。²¹³ 游仲鴻知雅州時，程公說為邛南校官，兩地相鄰。程公說嘗以所著《春秋官制》謁見游仲鴻，仲鴻異之，俾游似往丹鉛點勘，不以旅寓輟。後三十餘載，程公說之弟程公許知宜春(今江西宜春)，將其兄所著《春秋分紀》鈐版印刷，以廣流傳，特請游似為之序。游似因而從程公說次子光老(字子午)取其全書繙閱之，其序作於理宗淳祐三年(1243)四月。²¹⁴

牟子才字存叟，一字節叟，號「存齋」，隆州井研人，中嘉定十六年(1223)進士，歷館閣之職，累官權禮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理宗稱其才，度宗為太子時，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牟氏為井研著姓，自北宋徽宗崇寧五年(1106)牟邦基登第始，續有中進士者，與鄉貢者更是不絕。²¹⁵ 「牟氏……為三峽(隆州)詩書家」。子才父牟桂登嘉定元年(1208)進士，與簡州劉光祖、邛州魏了翁有交往，嘗命子才從了翁學，又與梓州吳泳為同年友。²¹⁶ 除魏了翁之外，牟子才又從楊子謨、虞剛簡及朱熹門人李方子學。有《存齋集》、《四朝史稿》、《易編》、《春秋輪

²⁰⁹ 《宋史》卷四百二十三〈吳泳傳〉，頁12625-27；卷四百八〈吳昌裔傳〉，頁12301-4。

²¹⁰ 同上注，卷四百三十七〈魏了翁傳〉，頁12966。

²¹¹ 同上注，卷四百十七〈游似傳〉，頁12496-98。

²¹² 同上注，卷四百〈游仲鴻傳〉，頁12149-51。

²¹³ 《鶴山集》卷五十六〈游忠公(仲鴻)鑑虛集序〉，頁475。該序之後半部分，當為魏了翁為另一人之集子所作序而混入此序中，因游仲鴻絕無可能與北宋時人唐子西(庚)、張芸叟(舜民)相識。

²¹⁴ 游似：〈春秋分紀序〉，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十九，頁十三下至十四下(總頁1002)。

²¹⁵ 葉桂年等：《光緒井研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40冊，卷十九〈選舉一〉，頁四上至九上(總頁473-76)。

²¹⁶ 《鶴山集》卷七十八〈牟君[忻]墓誌銘〉，頁644-46。

幅》等著作多種。李心傳以著作佐郎領史事，即成都修《四朝會要》、《中興四朝國史》，請牟子才和魏了翁從子高斯得為助手。高斯得分修光、寧二帝紀。²¹⁷

漢州綿竹張栻從子張忠恕(1174-1230)與魏了翁相友，了翁稱其學「斂華歸實，則蓋有志乎宣公〔張栻〕義理之學」。²¹⁸張忠恕字行父，學者稱為「拙齋先生」。理宗初即位，喬行簡等三從官輪日上殿，皆說天子之學與士大夫不同，獨忠恕對劄卻云天子之學正與士庶人同。了翁贊賞忠恕之言云：「畢竟有家學淵源。」全祖望云：「中興四大儒〔朱熹、陸九淵、張栻、呂祖謙〕之後，先生最有光于世學。」²¹⁹張忠恕晚年講學於嶽麓書院，士之出湖湘者皆從之遊。

梓州郫縣祿堅復(字子固，1173-1232)一生與安丙、劉光祖、楊子謨、崔與之、李臺、虞剛簡、曹叔遠、魏了翁為知己朋友，與了翁兄高定子亦有交往。除崔與之、曹叔遠外，其他均為蜀人。祿堅復先祖祿儒，北宋時舉賢良方正科，與眉山蘇氏厚善。堅復父以經學教授於家，堅復生十七年而父卒，舅氏傅堂先生王軫乃「潼之秀彥」，堅復率諸弟從王軫問學，夙夜不敢怠，習戴氏禮，有鄉曲之譽。²²⁰

雙流宋之源與魏了翁有同僚之誼。其父宋若水未登科前，其文即為邑令任淵、李燾所愛，行屈輩行與交。科舉入仕(紹興二十年〔1150〕乙科之冠)以後，益玩意於聖賢義理之學，以達於經。入朝為官，據經守正，不為苟合，為虞允文所知。任官衡州時，繼潘時之後，完成著名的石鼓書院的修復工作。有經史著作《經解》、《書小傳》、《史論》、《古今詩》、雜著、奏議等多種。宋若水使閩，未遑他務，而訪道於朱熹，並遣三子之源、之潤、之江從學於朱熹。三子克承父志，「皆嗜學而有文」。宋之源先學於朱熹，繼學於永嘉戴溪(字少望)，聞見日廣。魏了翁與之源切磋學問，「與君相得之深」。²²¹

眉州彭山師祖敬與魏了翁有交誼，了翁應其請，為其祖父師民瞻撰墓誌銘。師氏「子孫曼碩，世其書詩，為郡大姓」。師民瞻年十八試成都學官，文冠輩類。入太學，政和八年(1118)以上舍擢第。民瞻嗜學好蓄書，有《杜蘇詩注》及文集二十卷。了翁幼讀師民瞻《杜蘇詩注》，「於師氏〔民瞻〕注釋，明辯閎博，心竊好之」。²²²民瞻從兄師驥亦曾入太學，政和二年(1112)省試第一，遂登進士第，邃於《詩》。²²³師氏與華

²¹⁷ 《宋史》卷四百十一〈牟子才傳〉，頁12355-61；卷四百九〈高斯得傳〉，頁12322-28。

²¹⁸ 《鶴山集》卷七十七〈張公〔忠恕〕墓誌銘〉，頁634。

²¹⁹ 《宋元學案》卷五十〈南軒學案·直閣張拙齋先生忠恕〉附錄魏了翁《師友雅言》、全祖望案語，頁928。

²²⁰ 《鶴山集》卷八十四〈知威州祿君〔堅復〕墓誌銘〉，頁701-2。

²²¹ 《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三〈運判宋公〔若水〕墓誌銘〉，頁1645-48；《鶴山集》卷七十二〈知嘉定府宋君〔之源〕墓誌銘〉，頁589。

²²² 《鶴山集》卷八十七〈師君〔民瞻〕墓誌銘〉，頁721。

²²³ 晁公溯：《嵩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一三九冊，卷五十二〈師公〔驥〕傳〉，頁一上至三下(總頁285-86)。

陽范氏有婚姻關係。

資州趙昱為宰相趙雄之子，魏了翁岳母之弟。趙昱與了翁交誼很深，二人官於成都時，「未始三日不聚首」，相與切磋理學。魏了翁云：「習往聖之格言，燭義理之正宗，如君〔趙昱〕者，能拔然自立於頹俗末學之中，其於西南人士亦所少見者矣。」²²⁴虞剛簡為趙雄之婿，剛簡從趙昱得周、程等諸子之學，前已述及。

蘇易簡九世孫，徙居遂寧的蘇振文為藏書家，嘗與魏了翁切磋學問，劉光祖曾以賢良方正科薦之，不果。曾應魏了翁姻親任逢之邀，協助其編纂《合州墊江志》。²²⁵

眉州丹稜史堯輔(1173-1216)曾與蘇轍諸孫講學於德溪；開禧三年(1207)以《易》學冠同經生，中類省試高等。華陽人吏部郎范子長聞堯輔賢，合里中子弟而授之室，人人自以為得師。范子長請史堯輔協助魏了翁長兄高載修地理書，前已述及。魏了翁與堯輔亦相知，了翁任東川漕時，招堯輔至幕府。劉光祖嘗為其父史似孫撰墓誌銘。有雜稿及《諸經講義》。²²⁶

史守道(1173-1220)字孟傳，與史堯輔生同年，氏同族。年十四以能文名，自經子百氏及歷代國朝諸史，一覽不忘，故發於文則援據詳博，詞辯雄放，頃刻數千言。時學者倚周程諸儒先語以自標榜，孟傳為詩曰：「但使躬行皆孔孟，何憂吾道不周程。」²²⁷其後學日肆，名日大，願交者日廣。嘉泰元年(1201)魏了翁較士於眉，於史孟傳有知遇之恩，孟傳獨於魏了翁為平生交。魏了翁知漢州、眉州及持節潼(川府)、遂(州府)，史孟傳皆跟從之，達二十年。因與劉光祖、李壁相識，「皆恨相得之晚」。李壁嘗語及本朝明堂用吉辛故事，孟傳隨問辯對，不失一字。平生論著極豐，有《傳齋集》、《傳齋有用之學》、《春秋統會》、《周禮略》、《書略》、《詩略》、《廣編》、《雜抄》、《國朝名賢年譜》及未完成之《廣編稿》等。

邛州蒲江人譙仲午(1167-1225)字仲甫，第進士，曾任隆州教授，與魏了翁「居相鄰，學相友」。²²⁸兩人入仕以後，仍有書信往來。譙氏以儒學名家，有藏書傳統，譙仲午長於經史。

筆者嘗撰文所論之鄉先生，有不少師友關係應納入學術交遊圈中。²²⁹為免過多重複，茲僅舉二例。如邛州鄉先生李坤臣邃於經學，了翁弟文翁、了翁兄高稼之子高斯得先後從其學，族兄魏天祐與坤臣為久敬交，了翁嘗與之切磋學問。劉光祖守

²²⁴ 《鶴山集》卷九十〈哭趙廣安(昱)文〉，頁747。

²²⁵ 同上注，卷八十四〈蘇伯起(振文)墓誌銘〉，頁702-3；任逢：〈合州墊江志序〉，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十三，頁六下至七上(總頁928-29)。

²²⁶ 《鶴山集》卷七十一〈史君(堯輔)墓誌銘〉，頁580-81。

²²⁷ 同上注，卷八十二〈史君孟傳(守道)墓誌銘〉，頁681。

²²⁸ 同上注，卷七十六〈譙君(仲午)墓誌銘〉，頁628；卷七十〈譙府君春(椿)墓誌〉，頁569。

²²⁹ 鄒重華：〈「鄉先生」——一個被忽略的宋代私學教育角色〉，頁139-62。

眉州，除館待之，虞剛簡與張方亦敬重之。李坤臣另一弟子郭黃中，以學行著，與魏了翁為友。²³⁰郭氏為邛州人，郭黃中之父郭正孫(?-1231)，第進士，與魏了翁有交往。知興元府兼利州路安撫使，紹定四年(1231)蒙古攻蜀，力戰而歿。²³¹

蒲江李惟正(1152-1212)少力學，長遊成都學宮，受知於仙井李舜臣、遂寧楊輔、楊甲、成都勾昌泰、眉山蘇詵。李舜臣親授尚書，楊甲相與上下其議論。淳熙七年(1180)以後，凡四冠鄉舉，登紹熙四年(1193)進士，時年四十一，猶以讀書未廣。登第前，李惟正曾為鄉先生，了翁三兄高崇從其學。李惟正曾校類省試，魏了翁又獲惟正知遇。李、魏並有婚姻關係。²³²

李舜臣即史學名家李心傳之父，四歲知讀書，八歲能屬文，稍長通古今，推跡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天下。中乾道二年(1166)進士第。李惟正入讀成都府學時，李舜臣為府學教授。曾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間詣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曾重修《神宗實錄》，邃於《易》學，著《易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為學者稱之。所著書尚有《易解》、《尚書小傳》、《禮經讀》、《家塾編次論語》、《四書辨證》、《群經義》、《晉書辨證》、《四朝藝文志》、《鏤玉餘功錄》、《文集》等。²³³舜臣子李心傳，與魏了翁為友。²³⁴

楊輔、楊甲兄弟為遂寧人，二人與李舜臣同登乾道二年(1166)進士第，楊輔列甲科。李惟正入讀成都府學時，楊輔正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²³⁵楊輔兄弟五人自為師友，咸以文學行誼聞於時，人號「五楊」。與劉光祖歷事三宗，出入中外，嫻德齊名，天下稱曰「楊劉」。²³⁶楊甲曾作過國子學錄，有《六經圖》六卷，收入《四庫全書》中，人稱小楊。²³⁷

勾昌泰登第為四川類省試第一，曾除太學博士。²³⁸蘇詵未見著錄，或為三蘇族裔。

²³⁰ 《鶴山集》卷七十七〈李中父(坤臣)墓誌銘〉，頁635-36；《宋史》卷四百九〈高斯得傳〉，頁12322。《宋元學案》卷八十〈鶴山學案〉列郭黃中為鶴山門人，但魏了翁本人卻稱其為友。

²³¹ 《鶴山集》卷八十二〈郭公(正孫)墓誌銘〉，頁676-79；胡昭曦、鄒重華(主編)：《宋蒙(元)關係史》，頁51-52。

²³² 《鶴山集》卷七十二〈李君(惟正)墓誌銘〉，頁586-87。

²³³ 《宋史》卷四百四〈李舜臣傳〉，頁12223-24。

²³⁴ 《鶴山集》卷五十六〈游忠公(仲鴻)鑑虛集序〉，頁475。

²³⁵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楊輔傳〉，頁12096。

²³⁶ 《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十九〈邱劉諸儒學案補遺·莊惠大楊先生輔〉，頁十六上、十六下；《鶴山集》卷八十四〈漢州通判楊君(令圭)墓誌銘〉，頁700-701。

²³⁷ 同上注，卷七十九〈邱劉諸儒學案補遺〉記楊甲為昌州人(頁十六下)，《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亦如之，誤。

²³⁸ 《氏族譜·勾氏》，頁258。

〈鶴山學案〉中，尚列有一些與魏了翁有關係的學者，如列為鶴山學侶的了翁次兄高稼、四兄高定子，列為鶴山講友的臨邛人李從周，以及鶴山一些門人程掌、稅與權等，因無新資料補綴其交遊關係，茲不贅述。由於魏了翁與「二江九先生」中多位先生有師友關係，而像劉光祖、李心傳等重要學者又交遊於兩個學術圈中，實際上構成了一個更大的學術交遊圈子。丹稜李燾、井研李心傳本為南宋史學巨擘，惜他們及其子弟、兄弟等均未有文集流傳下來，雖然他們在上述兩個學術交遊圈中都有出現，但其交遊關係並不多，詳情已難以知道了。漢州綿竹張栻雖長期寓居湖湘，卻與不少蜀籍學者交往，並通過蜀籍弟子，使其學術在蜀中廣為流傳，在士人學術交遊圈中有很大影響。無論是「二江九先生」，抑或魏了翁、劉光祖、楊子謨等，都是以傳播理學為主，這反映了南宋中期以後的學術潮流。

餘論

士人學術交遊圈乃歷史上的文人學者在社會交往(包括師生、同學、同鄉、同僚、聯姻等等社會關係)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學術網絡。它對當時之學術發展有何作用?討論士人學術交遊圈,對當今學術史研究之意義何在?通過本文的論析,我們現在可以作如下之總結:

第一,士人學術交遊圈,使士人突破了獨自研習的局限,使學術變成了諸多士人共同研討的話題。學者間相互切磋,學術觀點得以交流,圖書資料得以共享,結果是大家受益,學術益彰。即使是出身於富有家學傳統家族的士人,亦可通過士人學術交遊圈,使自己的學術進一步得到豐富和發展。如資州李石,本有家學傳統,又與華陽范氏、眉山蘇氏交遊,成為南宋前期四川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學術家族間的聯姻,更使兩家之學術得以交融(按,本文所討論之士人學術交遊圈,還應加上士人學術家族間的婚姻關係。限於篇幅,本文中只是略為提及,詳細論證有待另刊專文)。

筆者曾研究宋代的鄉先生教育,表明這是家庭教育以外,宋代士人接受民間私學教育的主要形式。²³⁹由於士人學術交遊圈中的學術關係不少是由鄉先生教育的師生關係而形成(尤以北宋前期以樂安先生任奉古為主所形成的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最為典型),兩者有著密切的聯繫。而士人學術交遊圈,實際上是在家庭教育和鄉先生教育之外,士人接受學術薰陶的另一個更高層次的私學教育空間。士人們在家教、鄉先生教育和官學教育的基礎上,再經過士人學術交遊圈中師友間的切磋和互相激勵,其學術素養由此得到進一步提昇,學術思想得到進一步昇華。

第二,士人學術交遊圈,大多以某個或某幾個重要學者為核心,如北宋前期的樂

²³⁹ 參閱鄒重華:〈「鄉先生」——一個被忽略的宋代私學教育角色〉。

安先生任奉古，中期的華陽范氏、眉山蘇氏、梓州文同和成都呂陶，兩宋之際的譙定，南宋前期的李石，晚期的魏了翁；或若干重要學者聚眾講學，如使張栻之學得以在蜀中廣為流傳的「二江九先生」。學術流派，往往由此而形成。文人學者之學術，既得以在士人學術交遊圈中交流、傳授，又不斷地向圈外擴散。故士人學術交遊圈在學術上起到了很好的溝通和傳播的作用，對地方之學術風氣有著重要影響。

第三，研究士人學術交遊圈，使我們可以從縱橫兩方面瞭解一地學術發展之整體狀況。如宋代四川某個時期的士人學術交遊圈，為我們提供了這一時期四川學術橫向發展的圖像；而將各個時期的士人學術交遊圈串聯起來，則可以縱向把握宋代四川學術發展的軌跡。

從本文的研究，可以明顯地看出宋代四川學術發展的階段性特點。

北宋前期士人學術交遊圈的狹小，表明經歷了唐末五代的動盪時期之後，四川的學術正處於恢復和重新起步的階段。

自張詠治蜀以後，歷任治蜀官員亦都興學薦士，配合朝廷科舉取士名額的不斷擴大，蜀中士風漸變，讀書求仕蔚然成風。經過宋初的蘊釀期，至北宋中期，文人學者大量湧現，士人學術圈子急劇擴大。在這個學術交遊圈裏，居於核心地位之學者是華陽范氏、眉山三蘇父子、梓州文同、成都呂陶。其他重要學者，則有漢州綿竹宇文之邵、閬州閬中鮮于侁、眉山二任（伋、孜）、成都郫縣張愈、隆州仁壽員安輿、漢州綿竹楊繪等。慶曆之際，學統四起，新儒大量湧現，百家爭鳴，學術文化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四川與之同步，士人家族多崛起於北宋中期，北宋四川最重要的學者，亦都在這個時期產生。北宋中期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就包括了所有這些重要學者。從四川的例子可以看出，正是各個區域學術文化的發達，才形成了整個北宋中期學術鼎盛的局面。

兩宋之際，隨著大量著名學者陸續退出歷史舞臺，及社會漸趨動盪，士人學術交遊圈規模縮小。由〈李仲侯墓誌銘〉所引出的西川士人學術交遊圈和以譙定為首的東川士人學術交遊圈，可以看到其既上承北宋中期士人學術交遊圈，又下聯南宋，顯示了宋代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的延續性。自漢代以來，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川西地區（宋代稱西川）就是文化發達之區，其發展程度遠超過川東地區（宋代稱東川）。此狀況至宋代亦然，故宋代四川學術交遊圈多以西川士人為重。而以譙定為首之學術交遊圈，卻是以東川人為主的。譙定的學術交遊圈中，同時也有張浚、張行成、呂凝之等西川士人，張浚之學術交遊關係，更橫跨東、西川兩個學術交遊圈。上述情況不僅反映了東川學術水準的提昇，而且顯示了東、西川學術發展交融整合的趨勢。

經歷過兩宋之際的過渡階段，南宋時期，四川學術持續發展。南宋前期之士人學術交遊圈，基本上以資州李石為主而形成，華陽范氏、眉山蘇氏仍扮演著重要角色。前期仍以傳統經學、史學為學術發展之主流，中期以後，理學成為主流。南宋中晚期，無論是以「二江九先生」為中心，還是以魏了翁為中心的士人學術交遊圈，都是以傳播理學為主。四川的學術發展不僅逐漸追上南宋中期以後的學術潮流，而且到

晚期更達到當時理學的巔峰，形成真(德秀)、魏(了翁)並舉的學術局面。

通過本文的研究，宋代四川學術橫向發展的圖像和縱向發展的軌跡，較為清楚地展現出來。

第四，通常的學術史研究，乃以學者傳世之著述為依據。有些曾在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學者，由於種種原因而導致著作散佚。他們或被學術史研究者所忽略，或只能簡單地提及。如《宋元學案》稱宇文之邵為「蜀學之先」，但由於其學術著作散佚不存，僅剩下若干詩文殘篇，今天已難窺其學術之全豹。另一位同時的著名學者鮮于侁的情況與宇文之邵一樣。而筆者研究宋代四川士人學術交遊關係，根據當年與之交遊學者保存下來的記載，使我們知道，他們在當時是有很高學術聲望的學者。儘管他們遺佚的學術成果已不可挽回，卻可以還他們在歷史上應有的學術地位。研究士人學術交遊圈，正好可以為評價一位學者在歷史上的學術地位提供文本(text)之外的另一個機會。

第五，除必要情況外，本文一般不涉及蜀籍士人與外籍士人的交往關係。但仍可看出宋代四川士人學術圈與域外學者交往的大致線索。北宋前期四川士人的學術交遊基本上局限於本地，與域外學者少有交流，其學術影響亦限於本地。至北宋中期，許多學者如范鎮、三蘇、呂陶、文同、宇文之邵、鮮于侁等到中央或各地作官，以及外地學者到四川履職，蜀籍學者與司馬光、文彥博、趙抃、王安石、周敦頤、孫復、黃庭堅等名人學者建立了學術交往關係。蜀中學術開始產生全局性影響，具有學派意義的「蜀學」一詞由此產生。²⁴⁰此後四川學術更受到域外學術的影響，如譙定學於程頤，「二江九先生」傳張栻之學，魏了翁則兼承張栻和朱熹之學，使蜀學與洛學、湖湘學和閩學相交融。因此，研究不同地區士人學術圈的相互交往關係，有助於瞭解各地區間學術交流的情況與互動關係，並可從由此形成的更大範圍的士人學術交遊圈，把握一個時代的學術發展圖像和軌跡。

第六，士人學術交遊圈子歷代都有，如能將各時代之士人學術交遊圈加以比較，可以看出不同時代之特點。

筆者讀到一篇研究唐代文士群體的論文〈唐代江南文士群體初探(上)〉。²⁴¹該文探討了中唐以前的江南文士群體，計有「賀知章與越州文士群體」、「李嘉祐、劉長卿和江南文士」、「韋應物和江南文士」、「元稹、白居易和江南文士」等四個部分。可能因篇幅的限制(全文約八千字)，雖都冠以越州文士群體和江南文士，實際上只是側重討論小標題所列舉的幾個主要文士而已。唐代詩歌盛行，該文所涉文士都是詩人，

²⁴⁰ 參見《宋代蜀學研究》，頁2-3。

²⁴¹ 鄭學檬：〈唐代江南文士群體初探(上)〉，載朱雷(主編)：《唐代的歷史與社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378-89。此為1995年9月中旬在武漢大學舉行之「中國唐史學會第六屆年會暨國際唐史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選集。

文中所敘他們之間的關係，亦主要是相互間的詩歌唱酬。從該文「引言」所述：唐代文士們「以文會友、以書相知、賦詩酬唱、以酒助興、歌舞為樂，這類活動造成某種學術影響和思想影響，他們又往往是地域性甚至是全國性學派或思潮形成的基礎」，可知作者是意識到研究士人群體的學術史價值的。但該文注重士人的群體意識，以及聚會、宴飲和詩歌唱酬等交遊活動，仍主要是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視角。

該文使筆者聯想到這樣一些問題：是否唐代文士之間的交遊關係，僅止於詩歌唱和呢？研究士人詩歌唱和關係的學術史意義，是否僅止於文學方面呢？除了詩歌唱和以外，唐代士人是否還有宋人這種（如本文所討論的）學術交往關係呢？如果有，兩者有何異同？筆者相信，通過對唐、宋士人學術交遊圈的比較研究，釐清這些問題，必將有助於我們對唐、宋士人群體和學術文化之異同，以及士風、學風流變之認識，從而在整體上更好地把握中國學術史發展的脈絡。

或許有人會問，本文研究之所謂士人學術交遊圈，與黃宗義所撰《宋元學案》有何區別？筆者認為正是宋代區域文化的發達及各個地區存在著的大大小小的士人學術圈，使《宋元學案》的撰寫成為可能。《宋元學案》以清理學者師承關係、學術淵源為主，兼及學侶、同調等交友關係；採取羅列學者有關傳記資料的靜態撰寫手法，輔以少量的評論。

本文研究之士人學術交遊圈，著重的是同時代學者間的學術交往和互動關係，以及圍繞著若干核心學者而形成的學術網絡，不限於不同學案的劃分。在撰寫手法上，除傳記資料外，還廣泛利用記、序、詩、文等材料，盡可能動態地反映學者間的交往和互動關係。像華陽范氏、眉山蘇氏、文同和呂陶之間的密切交遊關係，以及眾多學者圍繞著他們而形成的龐大的學術圈和錯綜複雜的學術交往關係，是絕無可能單憑閱讀《宋元學案》而了解到的。像文同、李石這樣分別在北、南宋時期具有很大影響的學者，文同只是在《宋元學案補遺》中被補為蘇軾同調，李石則被誤為蘇符門人。又如居於北宋中期士人學術交遊圈核心地位的呂陶，在《宋元學案》中亦只是列為蘇軾同調而已；《宋元學案》僅記蘇在鎔為范仲黼弟子，而與魏了翁之交遊關係卻未提及。關於學者間的學術聯姻關係，《宋元學案》就更少涉及。

《宋元學案》是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史的重要參考工具書。而研究士人學術交遊圈，既可補充《宋元學案》及《宋元學案補遺》之闕遺，如樂安學派、方舟學派，又可補學案式研究之不足，從更大的範圍（可能包括多個學案）和縱橫兩個面向瞭解一地學術發展之整體狀況。

以上是筆者以宋代四川為例，對士人學術交遊圈這一研究取徑的學術史意義所作的初步總結。隨著討論的深入，我們對士人學術交遊圈的研究意義將會有更多的認識。

Academic Networks of Literati in Sichuan Area of Song China (960–1279): From a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 Summary)

Zou Chonghua

Previous academic studies on the literati in pre-modern China had a relative narrow focus either o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ertain individuals, or on his relationships with a small circle of teachers, friends and student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examine the history of the literati of Song China from a new perspective, namely, the intellectual networking among different circles of the literati.

Several cultural centres emerged in the Song dynasty, such as those in Jingluo (Kaifeng and Luoyang), Jiangzhe, Jianxi, Fujian and Sichuan, and within each of these centres there existed a dynamic circle or circles of literati who were active i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ursuits. This essay chooses Sichuan in the Song dynasty as a case in point and studies the academic networks of the literati in the area from a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an exa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ilieu of Sichuan, the author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First, the academic networks of the literati broke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individual and isolated study. They created a public space for the literati to exchange their ideas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Second, one or a few famous scholars often became the core of a circle and that helped to form bigger academic schools during that time. Third, a study of these groups and networks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s in the whole area. Fourth, the study could provide another way to evaluate a scholar's academic status if his scholarly works got lost in the past. Fifth, it could supplement the historical records such as those in *Song Yuan xue'an*, *Song Yuan xue'an buyi*, and others. Sixth, a study of the networking of the literati circles in different areas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academic ex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during the time. Seventh, marriages between the literati families further consolidated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circles and facilitated intellectual blending. Finally, if we compare the circles in different dynasties, we will understand better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pre-modern China.